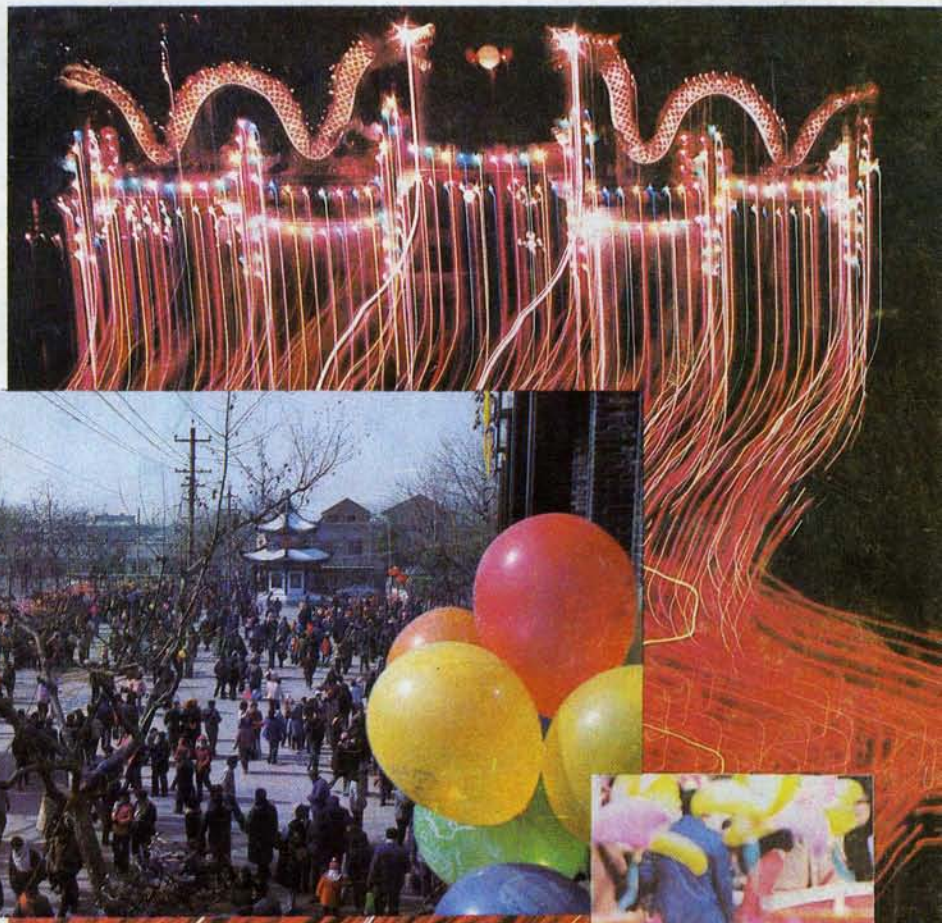
南京史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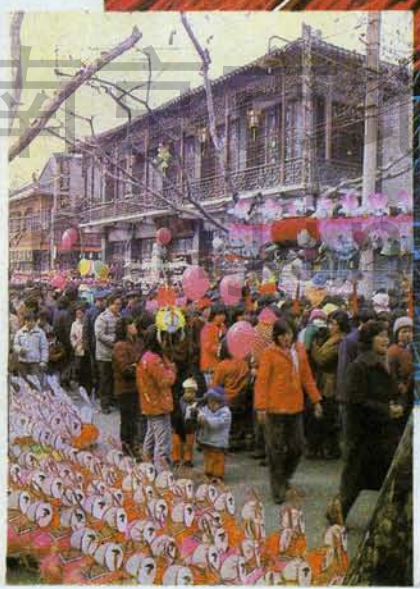
民初蔡元培赴京请袁　试谈方志篇目的科学性

汪精卫出逃经过　古都南京的历史特点

江左大才子袁枚轶事　世界七大奇观指哪些







dfz.

全国公开发行　总第二十六期

本期封二封三

明孝陵

刘晓梵辑



今享殿所挂明太祖像，原件为清末重建享殿所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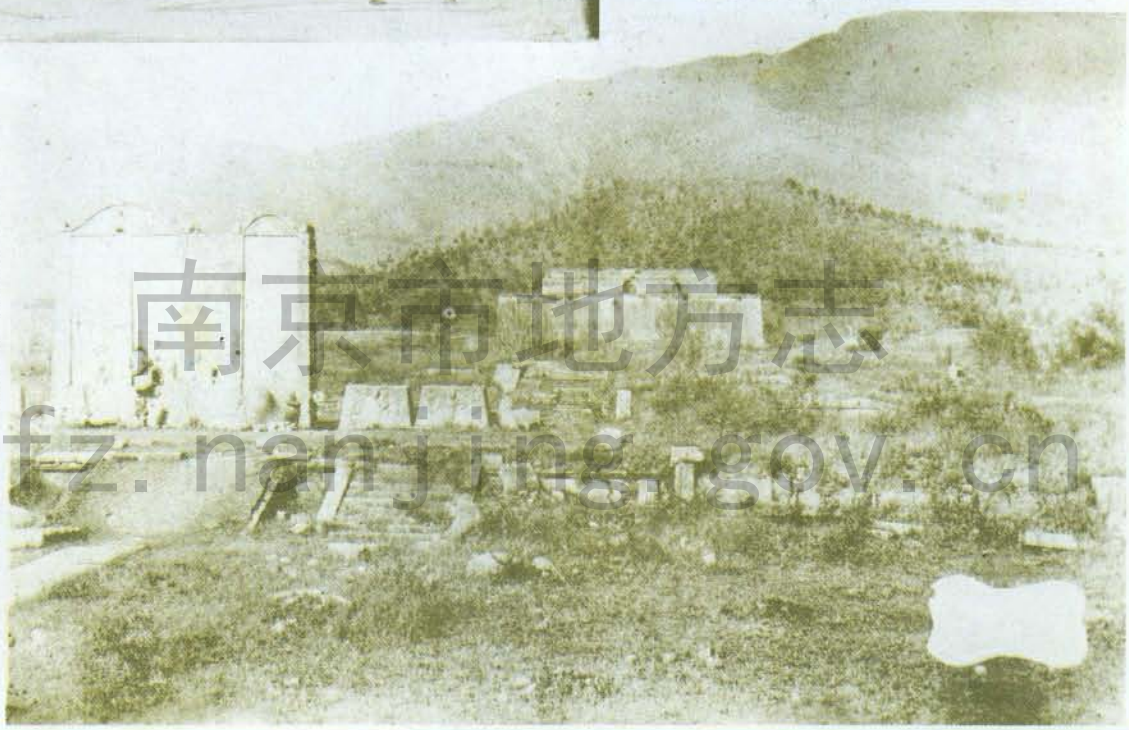
诸司官员下马牌坊。

孝陵神道两侧有石兽六种十二对，文臣武将各四尊。





神道石兽獬豸，独角无鳞，角已被毁，断残处清晰可辨。



百年前的南京明孝陵，此照片约为一八八六年所摄。孝陵享殿等建筑大都毁于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中，今所见享殿等建筑为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两江总督刘坤一所建，远小于原规模。

南京市地方志
fz.nanjing.gov.cn

南京史志

（双月刊）

1

1988

（总第26期）

·人物春秋·民初蔡元培赴京请袁世凯南下　强剑衷　2
孙中山逝世前后　刘　篷　5
汪精卫出逃经过　胡菊蓉　8

·钟山风雨·南京军事法庭审讯战犯实录
刘存汉　吴仲德　12
谭伦智退倭寇　朱清泽　童来喜　14

·方志研究·试谈方志篇目的科学性　杨之水　16

·经济纪实·爱字棉在我国落户经过　邵仲香　24

·石城变迁·秦淮之名何时有　乐华云　22

·古城新曲·寒山栖霞添钟鼎　枫叶红时访铸家
——访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
王引　孙逊　33

·文教今古·钟山之英　草堂之灵　山　岩　27
——钟英中学的创建与发展

·秦淮杂忆·金陵拾梦（连载之二）　潘子农　30

·志坛信息·中国地方志省志篇目讨论会
在南京召开　特约记者　38
中国地方志城市志篇目研讨会
在昆明召开　特派记者　37

·金陵胜迹·从梁园到湖神庙　李　源　35

·地名探源·金陵十八坊　方诚修　39
贪路口与仙鹅门　魏汉林　42

·县镇专栏·双牌石　刘德尚　梅小强　36
沧溪三元观联漫话　李遵澳　26

·衣食住行·漫话金陵菜肴　俞允尧　49
——京苏大菜在何方

·风情民俗·商联会与商人节　夏　蓓　53
漫话腊八粥　彭春生　51

·掌故逸闻·江左大才子袁枚轶事　郑　隐　43
赛珍珠其人其事　宋志成　48

·旅游问答·明陵神道旁的獬豸　刘　凡　54
浅谈貔貅　董宁宁　55
世界七大奇观是哪些　白　丁　34

·回顾展望·敬告读者与作者　本刊编辑部　56

·附　录·1988年《南京史志》总目录　334

·封面彩照·夫子庙元宵灯节　刘小元　钟建明　王立群
·封二、三·明孝陵　刘晓梵辑
·封底图片·南京名胜游览图　宋哲雷绘

主办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辑《南京史志》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市政府大院
印刷南京五四印刷厂
发行全国公开发行
订阅本刊发行组
代销新华书店、报刊销售公司
国内统一刊号：CN32—1024
南京工商广告许可证第56号
定价：**0.50**元　全年**3.00**元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民元伊始

蔡元培受命赴北京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当时唯一的立法机构——临时参议院，通过了首任临时总统孙中山辞职咨文中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政府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袁世凯是否南下？这是南北争执或者说是孙、袁争执的关键所在。孙中山的设想，是为了民国政府和袁世凯免受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干扰，免袁本人挟势自尊，促使国家走上法治轨道。而袁世凯却认为这是南方的"调虎离山计"，让他到南京当个空头总统。

迎接袁世凯南下的南方使者，其使命无疑十分艰巨。2月18日，临时参议院派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宋教仁、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4月21日蔡元培等启程，在途经天津时，蔡元培发表谈话称："南方友朋，对于余之此行，颇有疑余偏请袁总统之情面，余固决不如此；愿北方人士，亦勿疑余偏向南方。总之，此次一切关系于全国，绝不能以一方之意挠害全局。"

阳表欢迎　阴怀诡计

袁世凯用极为隆重的礼节，欢迎南方使者。正阳门外，高搭彩棚，匾额是用翠柏扎成的斗大的"欢迎"两字，五色旗帜迎风飘扬。27日，蔡元培等专使，在礼炮、军乐声中进入正阳门。袁世凯特派的迎迓人员，把专使接入宾馆，并派卫兵保护。

当晚，就有袁世凯的心腹以拜谒为名，摇唇鼓舌，陈述袁离京之弊，以动摇专使之意志。

袁世凯不愿离京，早在"真"、"咸"两电中，已见端倪。"真"电称："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咸"电更声称："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唇枪舌战　胜负未分

28日晨，蔡元培偕同汪兆铭（即汪精卫）、宋教仁拜谒袁世凯，递交孙中山亲笔函和参议院公文。袁世凯披阅完毕，开始会谈。

袁世凯说："我一直在想早日南下，跟各位共同谋求国家的统一，可是北方局面不稳，致迟迟未能脱身。其实我的才德不足，难以担当总统重任。不知何故选中老朽，紧催南行？难道中华大地还找不到一个超过我袁某人的强人？"

河东市地方志 dfz.hedongshi.gov.cn

蔡元培说："先生老成持重，海内久仰，此次当选，正为民国前途庆贺得人，何必过谦？南方参议院已推选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如果不去南方就任，象清朝委任先生执政一样，别说对国内，对各国影响也不好。"



1912年蔡元培等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任总统时在北京的合影

袁世凯说："既然清帝已经退位，国体已改成共和，哪里还有清朝委任我的说法。北方要我留着，南方又要我前去，我却苦于无分身法。至于论及国都问题，愚见以北京为是。"

宋教仁说："武昌起事，南京告成，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先生受国民重托，理应以民意为依归，何必恋栈北京呢？"

袁世凯说："六朝定都南京，南宋偏安江左，都不能号令中原，只有北京是元、明、清三代故都，是全国政治中心。再说外国各使馆，恐怕也不肯搬家吧。"

宋教仁说："天下之事，不可一概而论。刚才先生提到，江南只能是偏安之局，并非定论，明太祖建都南京，而后统一全国，即是明证。如虑及外人，则我国并非保护国，主权应操诸我手，政府南迁，彼等不得拒绝。况且辛丑和约，各国使馆驻兵，北京已成外国势力范围，民国新造，正好借此南迁，摆脱羁绊。即如为先生计，亦非南迁不可，若是仍定都北京，几疑先生为刘裕、萧道成之流，先生将何以解释？"

袁世凯骤然听到年少气盛的宋教仁一番话，不免恼火，正拟答辩，适他的外交能手唐绍仪到，大家招呼唐就坐。唐绍仪为了给袁世凯解围，淡化双方争执的紧张气氛，就说："我看定都一事，将来可以召集国会表决。各位今日之来，无非是邀请袁公南下，此事好说，不必争论，袁公也要竭诚欢迎远道来客。"

袁世凯当下起立道："我应敬谢诸位，并谢孙总统及参议员推举的隆情厚谊。承大义相勉，敢不竭力为国民造福，略俟三五天，如果北方稳定下来，谨当南行便了。"

接着袁世凯摆宴请客，宾主碰杯。表面气氛和谐，其实双方各怀心思，各自设计下一回合的继续较量。

忠厚的蔡元培，揣测道："袁先生总算答应了，我们过几天就可以跟他一起南下。"

宋教仁已摸透袁世凯的心思，他说："看来我们要空忙一场了，老袁这个人，一步十计，心里想的是东，嘴里说的是西，今天这么说，明天就推翻。"

汪兆铭说："国都问题，老袁讲的也有道理。不过，教仁的答辩很有分量。"汪兆铭的两面性已稍稍透露出来。

蔡元培说："他用诈，我用诚，他或负我，我不负他，便算于心无愧了"。可以看出，忠厚的蔡元培，也并非不知袁世凯的狡黠本性。

制造兵变　吓唬使者

29日晚，蔡元培等在酣睡中，忽然枪声四起，熊熊大火浮现窗前，一个个都被惊醒。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窗外射来一颗子弹，哗啦一声，破墙而出。

汪兆铭不安地说："真的发生兵变了！"

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老袁的手段。"

这时听得外边有人喊："里面的人快滚出来，老子开枪啦！"

又有人道："弟兄们，要守纪律，这里住着南京来的使者。"

嘈杂的人声："他们要袁大人南下，我们正要给点厉害他们看看。"

大门外接连几声响，大门上顿时撞击出几个窟窿，蔡元培等见状情急，连忙从宾馆后面翻墙逃走。逃走时想找仆役帮忙，而未见人影，显然是个内外勾结的预谋。

蔡元培一行，从僻静处转到袁世凯官邸。袁世凯前来迎迓，口称："诸位受惊了。"

蔡元培问道："到底是什么人作乱？是兵还是土匪？"

袁世凯回道："我正派人调查。"

有人报告："袁大人，东华门、前门一带，乱兵放火。"

宋教仁听了乘机问道："北方将士，唯袁先生是从，何故还会捣乱？"

袁世凯答道："我还未走，他们已瞎闹起来，我如已动身，那还得了！"

又有人报告："乱兵们扬言要赶走南方使者。"

袁世凯立即呵叱："休得乱报。"

袁世凯对蔡元培说："昨天宋先生说我恋栈北京，其实我有什么舍不得，定要居住在北京城呢？"

宋教仁想回敬袁世凯几句，被蔡元培以目示意制止。

袁世凯又是一番招待，以酒压惊，不一会儿天色将明，有人来报告："局势已平静，乱兵已散走。"袁世凯随即安排蔡元培等就寝。

30日上午10点，蔡元培等起身，刚吃了早饭，只见袁世凯匆忙前来，手持急电译稿，口称天津、保定有兵变消息。

此后两日，袁世凯未露面，却派人不断向专使避难地六国饭店送达警报，说日本拟派兵入京保卫使馆，说各国公使馆也在考虑增兵等等。

蔡元培和宋、汪两人协商："看来，袁先生不好南下了，北京如此多事，我们实不便强袁离开北京。"

宋教仁指出："这些都是袁世凯的妙计。"

袁世凯此后会见专使，闭口不谈南下就职的事，而表示他对北方秩序应当负完全责任，并且为了避免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态，他建议让他本人暂留北京六个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任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

蔡元培审时度势权衡利害，认为只要全中国和平统一，袁世凯不南下也行，如果他定要在北京建都，我们也不能不迁就。他主意已定，即日给南方发出专电："为今日计，应速建统一政府，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南京临时参议院集会讨论，至3月6日议决办法六条，其要旨是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先行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

袁世凯接到参议院电文，心花怒放，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遥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南方革命党人在"调虎离山计"破产后，退而求其次，只得图谋用临时约法钳制袁世凯。

昭告全国　透露真相

蔡元培专使的迎袁使命结束，于3月12日在《民立报》上发出《告全国文》，委婉地诉述经过并表示专使的看法。

《告全国文》开宗明义指出：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孙中山逝世前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 蓬

1925年1月26日晚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这一天，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动了手术，病情仍不见好转，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正在商量着趁孙先生未临危之前，求先生留一个遗嘱。虽然医生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但大家觉得先生的毅力顽强，多想想办法，即使不能完全痊愈，也总能有一年半载的生命可以维持，同时又觉得，和先生提起遗嘱之事，让先生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对先生大大不益。人们商量来商量去，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最后大家决定，不到最后时刻，是决不能向先生直说的。

2月18日，久病不愈的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了出来，住进了铁狮子胡同11号（今张自忠路23号）。可人们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到了2月24日上午，孙中山的病愈发加重了。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房间里只留下汪精卫、宋子文、孔庸之和孙中山之子孙哲生。汪精卫婉转地对孙中山说："先生进了医院后，许多同志都觉得要让先生留些话给我们，假使先生的病不好，我们还可以听先生的教训，十年二十年后也可以受用。"孙中山回答说："我生是有话要说的，我死便由你们去做，也不必我说了。"在场的人回答："还是愿意听先生的话。"

孙中山说："我如果留下话给你们，是于你们有许多危险的。现在许多敌人在围困

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

《告全国文》评述在北京工作过程称："培等27日到北京即见袁公，28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辞位至危疑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公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无何而有2月29日夜半之兵变，3月1日之夜又继之，且蔓延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于是袁公提议，请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

《告全国文》最后不得不以委曲求全的语气称："今也袁公虽不能于就职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后之变通办法观之，则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私，参议员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见，足代表大多数国民，既皆昭揭于天下。"

博尔吉斯方志 dfz.mianfeisoft.com

着你们，我死之后，他们更向你们进攻，如果你们强硬对待他们是危险很大的，我看还是不说好，好叫你们对付环境容易一点。”

汪精卫急切地说：“我们晓得大部分同志都能够听先生的话，先生教训我们很久，也应该相信我们是不怕危险、不怕敌人的。”孙中山听了这些话，只是闭着眼，点着头。

汪精卫又说：“你要说什么话，随便就好，也不必太费心。”孙中山说：“我已经著有很多著作了。”汪精卫答道：“先生，你著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都记住了，但还想请先生说些总括的话。”“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先生听。如果先生赞成，便请先生签字，如果先生听了不赞成，便请先生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记录下来。”

汪精卫即取出一张纸，低声读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了，点头说：“好的，我很赞成！”

孔庸之上前请求道：“先生对于家属可不可以也照这个样子，说几句话呢？”

孙中山说：“可以。”

汪精卫又取出第二张纸，继续低声读道：“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我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又点头说道：“好的，我很赞成！”

汪精卫要请孙中山签名，这时候，宋庆龄从外面走了进来，孙中山见宋庆龄神情悲伤，不愿再伤她的心，就对汪精卫说道：“你且暂时收起来罢，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汪精卫等人不敢再请孙中山签名，只得将其收好，并报告了政治委员会。这份未正式签字的遗嘱由政治委员会签字证明后，交汪精卫暂存。

3月10日晚上，孙中山病危。11日早上，何香凝急匆匆来找汪精卫，一见面就着急地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汪精卫也感到不能不直接向孙中山说明了，但这事得预先同宋庆龄商量。于是就由何香凝、宋子文两人事先把此事对宋庆龄说了。宋庆龄虽然悲痛欲绝，但她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悲伤，说：“到这时我不仅不应阻拦你们，还要帮助你们。”

这时，孙中山病状已濒危急之境，但神智还清醒。他把宋庆龄、孙哲生、汪精卫等人叫到床前，让他们把遗嘱拿出来。何香凝把汪精卫手中的两份遗嘱接过来，取了孙哲生身上的一支墨水笔，一同交给了孙中山，由宋庆龄把着他的手腕一笔一笔地签上名字，签完了国事遗嘱又签了家事遗嘱，同时还签了由他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联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英文。孙中山说道：“余此次北来，欲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来，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成，希望诸同志能努力奋斗，早日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吾死亦瞑目矣！”

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尚保持清醒，能进食少许。后来，开始感到极度不适，时常用手抚着胸口，急促地喘气。8时35分，看护想再为他喂一点牛奶，但已不能自纳，口中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或用中文，或用英文，朦胧中听得是“救中国”“同志奋斗”“和平”等数语。过了一会儿，孙中山又呼汪精卫，汪急忙走到床前，孙中山欲有所言，但已不能出声。9时30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溘然长逝。终年59岁。

1925年5月16日，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孙中山遗嘱案，并发出郑重宣言，决定各党部每次开会都要恭诵总理遗嘱。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对接受孙中山遗嘱形成了一个决议案，议案的条文是：“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孙中山的遗嘱，人们用镜框镶好，放在孙中山的灵前，让大家共见。后来又送至广州，严谨地保存起来。解放后，孙中山亲笔签署的两份遗嘱及致苏联同志信的原件都妥善保存在当年孙中山逝世的地方。最近，宋庆龄基金会又征集到了孙中山当年签署遗嘱的墨水笔，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时，连同墨迹、衣物等一同展出。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离经叛道、卖国求荣自不必说，蒋介石背离三民主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使中华民族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也是世人共见。就连孙中山的安葬也颇有一段曲折。

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委任张静江、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宋子文、林焕廷、陈去病等12人为葬事筹备委员会成员，并由孙哲生为家族代表，协同办理后事。

筹委会首先开始着手孙中山陵墓的营建。陵墓地点选在紫金山的南坡中茅山，孙中山早在1912年来这里打猎时，就表示百年之后愿安葬于此。于是筹委会便向北京内务部和江苏省署交涉圈地。接着筹委会便开始悬赏征求陵墓的建筑图案。自1925年6月至9月15日止，筹委会共征得图案三十多种，筹委会最后决定采用吕彦直的图案。

1926年1月，中山陵正式破土动工，开始营建。当时江浙两省的军阀正在打内战，沪宁线的交通时常受阻，给营建任务带来许多困难，吕彦直身为总工程师，四处奔波，废寝忘食，为便于运输建筑材料，他又设计了营建从紫金山南向直出连接钟汤路的一条宽4丈，长6里的大路。同时，筹委会又专门请了捷克名雕塑家高琪，精雕细刻了同真人等同大小的孙中山大理石卧像。整个陵墓一共修建了三年，1929年春完成，耗资800920两。

那么，在这三年的营建过程中，孙中山的遗体保存情形怎样呢？

孙中山逝世七天后，遗体被放在美国制作的楠木棺中送往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国上下哀悼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仅中央公园一地，就有746800多人前来吊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来唁电，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悼念孙中山先生。

同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被送往北京碧云寺石塔内保存，沿途护灵的群众达30万人之多。

然而，孙中山的遗体在碧云寺的三年中，也时常受到军阀混战的威胁。

1927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军阀，把直鲁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打得一败涂地，同年9月18日，张宗昌以“孙中山停灵风水好，所以南军屡次告捷”为由，同张作霖密谋焚烧孙中山遗体。这一消息被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听到后，火速私下通知了守灵的友人。12月25日夜里，守灵官兵把孙中山的遗体秘密地转移到水泉山洞，一直藏至1928年6月张作霖退到关外为止。

1929年5月18日，宋庆龄来到北平，商量如何把先生的遗体移至刚竣工的南京中山陵。5月23日，北平各界举行公祭，26日孙中山的遗体由碧云寺抬出，其衣帽等仍封于石塔内保存，称为“衣冠冢”，遗体移入美制铜棺内由津浦线一路南下，28日到达浦口，改乘威胜轮渡江，在下关码头上岸。6月1日，正式葬于南京中山陵。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想把孙中山的遗体迁往台湾，但因墓室坚固无法打开，又不便使用炸药，中山先生的遗体，便安然保存于墓室下5米深处，完好无损。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中山陵，精心维护，重点绿化。现在的中山陵气势宏伟，绿荫环绕，成为人民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场所。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汪精卫叛逃经过

作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 胡菊蓉

汪精卫叛国投敌，堕落为民族败类，是有其由来的。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其抗日。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等致电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请他回国主持工作。那时，全国抗日热情正在高涨，汪精卫在国内的喽罗们，唯恐汪归来后，信口雌黄，重弹反共老调，遭全国人民的唾弃，于是，商议决定由陈公博赴香港，将国内变化了的情况告诉汪精卫。但汪不予理采，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汪与赴港迎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周佛海的观点是一致的。周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十分反对。两人一见非常投机，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阴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主张对日谋和。汪精卫的这种妄自菲薄的民族失败主义，使他逐步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抗战的头三个月，日军伤亡约五万余人，日军遭到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预感中日战争长期打下去，将对日本不利。为了摆脱困境，妄图实现其不战而亡中国的野心。1937年10月，日本通过德国陶德曼进行“和平”斡旋。汪精卫趁此机会，竭尽全力促进“和谈”。12月5日，他在接见记者的时刻散布“和平”论调。第二天又召开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日军攻陷南京，把“和谈”条件提得更苛刻。汪精卫却到处游说：同意日本的条件，快快签字画押。虽遭碰壁，仍贼心不死，正如他自供的：芦沟桥事变以后，对于中日战争，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16日，日方因中方未能如期答复接受他的“和谈”条件，于是由其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了。

2月，周佛海征得汪精卫的同意，让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法委员林柏生，分别在香港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情报为名，与日本暗中勾结。据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回忆：那时高宗武等人在香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3月29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周佛海分别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副总裁、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周佛海利用职权，“即着手打开与日本交涉之门。”① 指使高宗武往来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特务、前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多次密谈，商讨“中日和平条件。”有一次，高宗武说，他们的后台是周佛海，日方连忙摇头说：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出重大“让步”。周佛海等认为非汪精卫莫属，汪又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而汪虽位居副总裁之位，却无实权，早心怀不满。当周佛海向汪精卫汇报了这些详情后，汪马上表示：“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②老谋深算的汪精卫深知日本外交政策的决策，须经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否则是不算数的。于是陈

璧君（汪精卫之妻）便放出空气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③

7月5日，汪精卫指使高宗武出走日本，摸清日方的真正意图。高在东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等军政要人进行多次会谈，双方认为，除汪精卫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7月12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确定了"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扬言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摸清日方的意图后，汪精卫便死心踏地沿着叛国投敌这条线滑下去。

为了加快"和平运动"的步子，汪精卫等又策动梅思平（原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赶赴香港，与高宗武合谋对日"和谈。"从8月至9月，他们在香港与日方秘密谈判五次，确定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脑的方案。

1938年11月，汪精卫心腹高宗武、梅思平及翻译周隆庠（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带着他乞求"和平基本条件"，在香港分别秘密乘意大利轮船"戈普特亚号"、法国轮船"道尔曼号"到达上海，与日方今井武、西义显、伊藤芳男等秘密会谈，地点选在上海日军占领区虹口东体育会路重光堂举行（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住此宅），日方对"和平基本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今井武夫带着这个方案于11月15日返回东京，向日本当局报告。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出席了会议并通过了上述方案，定由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负责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日方代表于18日到达上海。20日，"由于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条款，仅止于修正词句，极为简单地结束了会议。"④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

《日华协议记录》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具体行动计划，现将其公诸于众。

昭和13年（1938年）11月20日，中日达成如下之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　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第四条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　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六条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以内全部撤兵完毕。在此期间，中国保证治安之确立，驻兵地点经协议后决定之。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附件一：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一、第一条防共驻军，是为确保内蒙及

联络线，而在平津地方驻扎日军。又，其驻扎期限即为日华防共协定的有效期限。

二、第四条所谓优先权是指与其他国家同一条件下，对日本提供优先权之意。

三、日本协助救济因事变而造成的难民。

附件二：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加强善邻的团结，约定今后实行下列各款：

第一条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教育及政策。

第二条　日华两国对苏维埃联邦设置共同宣传机构，并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平时互相交换情报。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日本军于必要之地区、中国军于新疆驻扎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联合作战。

第三条　日华两国合作，使中国逐步从东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共同努力，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条　日华两国以复兴东洋经济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

又，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以同一原则实行经济合作。

第五条　为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设置必要的委员会。

第六条　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参加本协定。

11月21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带着他们阴谋的结果，返回东京，向日本当局报告，经日本政府同意，并商定以中日协议记录内容作为近卫文麿第三次对华声明予以发表。然后今井武夫再到上海，等待重庆汪精卫的答复。日方还在香港继续与汪精卫集团保持联系。

梅思平于11月25日从香港乘飞机潜回重庆，与汪精卫等秘密协商以后，带来了同意的答复，于12月1日返回香港，将汪的决定告诉日本在香港的西义显。汪精卫答复的要点如下：

"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

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⑤

当日方收到汪精卫的答复后，便告知汪精卫，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重光堂会议还草拟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及汪从重庆叛逃的计划。

根据会议协定的规定，汪精卫于12月5日以前要逃出重庆。所以会后，汪便加紧叛逃的准备工作。汪叛逃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越南，他们选择了从重庆经昆明到越南的线路。

这次跟随汪夫妇叛国投敌的有周佛海、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等，为防止暴露，他们分散出走。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先溜到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到达昆明。当时的陈公博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汪精卫派一名副官赶到成都告诉陈，要他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汪本人则托词到成都、昆明演讲。汪在重庆的子女，则先由其内侄陈春圃护送至昆明转河内赴香港，而陈春圃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等候汪的电报，以便给汪预定由昆明至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运往河内。汪精卫的叛逃准备工作，是在极端秘密下进行的。

就在汪精卫紧张地准备叛逃的时候，蒋介石于12月7日从前线衡阳返回重庆，蒋的回渝，打乱了汪精卫的叛逃计划，原定12月8日逃走是不可能了。汪精卫等做贼心虚，以为

南京市档案馆 dfz.nanjing.gov.cn

叛逃计划已经暴露，为蒋介石所知然，所以惶恐不安。同一天（7日）周佛海也收到陈布雷要他立即返任的电报，非常恐惧，他曾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作过详细的描述："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来，会有这样巧合吗。同时我还想，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不过在担心，我虽然去河内，是否连累汪先生。"⑥于是周佛海立即派人到重庆见汪精卫探听消息。汪告诉他，到目前为止，蒋介石还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周佛海才喘过一口气。

汪精卫在重庆被蒋介石拖住，不能如期逃出重庆。在昆明等候汪精卫的陈春圃，不得不取消为汪代定的火车包厢，等待重庆的消息。有一天，陈春圃收到重庆拍来的密电，他将电报译出：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不解其意，去问周佛海是什么意思。周说兰姊是指汪精卫，秀妹是指日方，电文意思是说，汪因为有事不能如期逃出，要通知日方，不要因为他迟逃而耽误了日方发表声明的日期。周立即要陈春圃将此电转发给在香港的高宗武，以与日方联系。

12月18日，汪精卫乘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全体年青中央委员训话的时候逃走。飞机票是由汪的内侄托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搞到的。上午9时，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四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精卫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赶到机场。当陈璧君等人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碰上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搭机赴滇，陈叫曾仲鸣上前应付周，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飞机预定起飞时间将到，汪精卫还没有到来，陈等很焦急，立即嘱曾仲鸣，如汪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汪乘搭，令飞机延迟起飞。直到飞机开行前几分钟，汪精卫及其卫士桂连轩才赶到，这时陈璧君才告诉周至柔，说汪赴昆明讲演。同机的周至柔，为了讨好汪，亲自驾驶飞机。陈璧君疑虑重重，以为周是受蒋介石派遣跟踪汪精卫，要将飞机开回重庆的。直至当天下午一时飞机抵达昆明，周走出驾驶室向汪致敬时，陈璧君等才放下心来。

在昆明的陈春圃早已接到汪的电报，并告诉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僚属及乐队，到机场隆重欢迎，昆明街上的商店也挂起国旗表示欢迎。汪见状生气地对陈春圃说，为什么不按他的电报办事。原来汪给陈电，只要龙云一人来接，人多则不易保密。而龙云有他的打算，如果他一个人去接，怕给人以事先知道汪精卫借道出逃的话柄，以后对蒋介石不好交待，所以龙云才布置这样隆重场面。

汪精卫借口旅途疲劳，"改日延见"地方官员，而单独与龙云进行了长谈。

陈璧君告诉汪精卫，明天要是天气不好，要作好改乘火车的准备。汪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⑦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曾仲鸣、陶希圣等十多人，乘上了由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叛逃至河内。尾随至河内的有陈公博等人。

汪精卫抵河内后，三易其住处，最后住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又派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等赴香港，伙同在港的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与日方勾结。陈璧君则往来于香港、河内之间进行联系。曾仲鸣留在河内。

日方得知汪精卫已逃至河内，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声明，称之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南京军事法庭审讯战犯实录

刘存汉　吴仲德

1946年1月19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和同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通告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决定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地点设在东京。根据当时国际法原则和由中、美、英、苏等11国组织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战犯由直接受到侵害的国家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当时中国政府按照这一规定，于1945年11月6日成立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犯处理委员会，作为当时国家处理战犯的最高权力机构。同年12月中旬，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十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由石美瑜任庭长，下设审判官5人，检查官2人和其他各类职员。

南京军事审判法庭所审理的主要对象，是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中国平民300余人的刽子手田中军吉和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岩、向井敏明等战犯。

战犯谷寿夫，是侵华日军的高级指挥官，曾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外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演习课长、陆军省军事调查委员长、旅团长、要塞司令官等职。1936年任第六师团长，1937年8月1日，率部侵入我华北，不久又随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经昆山、渡太湖，尔后向南京地区进

为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的方针”即近卫对华第三次声明，声明说：一、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二、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地域。三、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声明最后还说，“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日方这个声明单方面修改了重光堂“密约”，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狼子野心。汪精卫也明知日本变了挂，但叛国投敌决心已定。于12月27日，把响应近卫的“艳”电及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亲笔信交给陈公博等人，要他们赴香港找顾孟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表。陈先生找顾孟余，顾反对发表，他说此举既害国家，又毁自己。陈找周佛海，并告诉他顾孟余的意见。周大怒，骂顾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力主发表。林柏生也极力赞成发表，并说，“汪先生此电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艳电》，于12月29日在香港林柏生控制的《南华日报》上发表，留下了铁的历史罪证。

注：① ②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③相惺华：《大汉奸周佛海的几件事》。
④ ⑤ ⑥《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初版。
⑦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犯。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首先攻入中华门，谷寿夫命令部队“向城内实施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的三光政策。在其所驻的中华门一带，是杀人最多，暴行最惨重的地区之一。鉴于谷寿夫的上述罪行，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战犯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

战犯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日本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同年8月引渡来华，关押在上海战犯拘留所。由于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侦讯便利起见，所以不久就将其解来南京，关押在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提审战犯谷寿夫。谷寿夫对于他在1937年12月13日率部侵入南京，供认不讳。但是，他又极力为自己的各项罪行进行辩护，妄图逃脱罪责。他说：“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方面扬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是南京大屠杀的中心地点。而“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①，就是说南京大屠杀“与我第六师团无关”。②10月28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全市张贴布告，号召南京人民特别是中华门一带的受害者及其亲属起来揭发、控诉战犯谷寿夫的罪行。12月21日，法庭在侦讯战犯谷寿夫的时候就有400多名证人，证实谷寿夫部队在1937年12月13日到21日在中华门附近的犯罪事实。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战犯谷寿夫哑口无言。谷寿夫妄想从时间、地点上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完全不值一驳。

194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以战犯谷寿夫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进行起诉。

“……该被告处心积虑，从事侵略，破坏国际和平，侵犯我国主权，在战争中又以违反人道及战争法规种种暴行，加诸手无寸铁之平民，并在南京造成旷古未有之浩劫，穷凶极恶，举世共愤，并应科处极刑，以维正义与和平。”

“……爰依中华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七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三十六款、第三十八款，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起诉”。③

1947年2月6日下午2时，在南京励志社（现中山东路307号）门前站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秩序井然。人们通过广播喇叭收听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公审的实况；庭内有上千人出席旁听、座无虚席；法庭上有80多人（其中有三名外国人），是亲历目睹谷寿夫等部在南京暴行的证人。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出庭作证，他说：“自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死、刺伤与强奸平民，并枪杀彼等认为曾充当中国军人之非武装人民，情势万分严重，达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内，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亲见日本兵枪毙中国平民，满城各街尽是死尸。”④南京市居民李秀英出庭作证，她说：“……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因有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⑤

“12月19日上午9时，来了六个日本兵，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准备奸污，我不甘受辱，就同日军拼死搏斗。我身上被日本兽军刺了三十多刀，当时昏死过去。这三十多处伤疤，就是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见证。”⑥金陵大学贝德斯教授的证词和市民李秀英等人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全体听众的愤怒，有的高喊“绞死他！”，有的喊“用刀子割死他！”，有的咬牙切齿紧握着双拳……。人群一阵浮动，庭内庭外一片叫骂声。

此时，战犯谷寿夫在罪证面前低下了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谭纶智退倭寇

朱清泽　童来喜

明朝抗倭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抗倭将领。其中就有一位威震东南的抗倭名将，曾经因战南京，智退倭寇。他的英名叫谭纶。谭纶(1520～1577)，明朝军事家，官至总督蓟州军务、兵部尚书。江西宜黄县谭坊乡人。他一生南抗倭寇，北守边陲，“终始兵事垂三十年”①，“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②，可谓战功卓著，威名赫赫了。这里仅说说谭纶在南京任职期间打败倭寇的战绩。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国政日腐，海防废弛，官兵谈倭色变，战斗力极低。倭寇乘隙猖狂进攻。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一股倭寇从浙江上虞登岸，掠杭州，过淳安，入南皖绩溪、芜湖等地，复折东返，直逼南京。沿途，倭寇似豺狼，如虎豹，百姓见状，纷纷避逃。七月，倭寇窜至南京板桥，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军300余人抗击。结果，朱襄战死，蒋升坠伤，士卒阵亡。倭寇得志更猖狂，迅速进至南京大安德门。

倭寇兵临南京消息传入城中，文武百官丧魂落魄，面如土色，纷纷躲入官府宅院，将士“怯懦无敢前”，③百姓闻讯，携女拖儿到处逃避，整个南京城处于一片惊恐、混乱之中。就在这关键时刻，心怀报国志的南京兵部主事谭纶，义愤填膺，决心痛打倭寇，为民除害。他毅然叩开兵部尚书周延的府门，毫不惧色地说：“尚书大人，倭寇攻城，官军难御，请允我自募壮士五百，与贼寇决一死战。”谭纶的请求被允诺，他一面深入民众，挑选体魄健壮、力大无比的彪形大汉500名，进行应急训练；同时派遣一壮

头。他大约已意识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双手和双腿开始颤抖了。

南京军事法庭经过周密调查、核实罪行材料后，确认战犯谷寿夫犯有屠杀、强奸、焚烧、抢劫等罪行。法庭判定：

“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则更以剖腹、枭首、枪杀、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⑦

法庭根据上述结论，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国际海牙陆战规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七款，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国际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第二条，第三条；中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十一条；中国刑法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前段，第五十七条判决：

“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士巧扮乞丐，混入倭巢，诱敌就范。

狡猾的倭酋见此丐耳聪目明，相貌堂堂，顿生疑窦，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给他来个下马威，啪！啪！啪地三个耳光，凶神恶煞地问道："你打何来？"壮士如实回话："从城中而来"。"嗯，从你城中来"。"是啊，刚从明军大营行乞被赶出来"。"哦，你既然从明军营垒中出来，那么我问你，城中明军兵力多少？设防如何？"壮士见倭酋渴望从自己口中得到情报，心中暗喜，但表面却胆颤心惊，吞吞吐吐不敢直言。倭酋顿变面颜，满脸堆笑地说："你的不用怕，说出来大大的重赏"。壮士故意推辞，"我为行乞之人，哪知兵事"。"不，你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壮士将计就计，按着谭纶的嘱咐，把事先编造的一套假情报和盘托出，引诱倭寇仓卒攻城。倭酋得知守城明军戒备松懈，尤其是小安德门（今雨花镇）和夹冈门（今双龙桥）防守最为薄弱，心中大喜，慷慨赏给乞丐白银十两，并下令官兵提前就寝，明晨兵分两路出发攻城。壮士见倭寇中计，乘夜速归城向谭纶报告了倭寇兵力、兵器、行动计划等情况。谭纶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立即组织壮士隐伏在小安德门和夹冈门外倭寇必经之道的两侧树丛之中，待机而动。

七日二十四日深夜三更时分，倭酋手持大刀，头戴羊角帽，神气十足地按照预定计划，疾速向小安德门和夹冈门方向开进，沿途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倭寇由之放松戒备，嬉闹而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谭纶布下的伏击圈。正当倭酋口哼小曲、洋洋自得之时，谭纶下令伏兵出击。隐伏的壮士们早已急不可耐，闻命如同离弦之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倭阵，刀砍、剑劈、枪刺，杀伤数倭。倭寇突遭袭击，晕头转向，完全失去还手之力，纷纷丢刀弃械，狼狈逃窜。谭纶指挥壮士乘胜追击，迫使倭寇落荒而逃。不久，这股倭寇残余窜至太湖地区，终被明军官兵歼灭了。

谭纶在南京城下重创倭寇之举，朝野震惊，特别是兵部官员无不敬佩谭纶有勇有谋，智慧非凡，百姓得悉谭纶智退倭寇，个个奔走相告，南京城很快恢复了正常，民众安居井然。谭纶的威名从此传遍全国，并开始了他那崎岖转战、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

注：

①⑤《谭襄敏公奏议》；②③④《明史·谭纶传》

产，处死刑。"⑧

1947年3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将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要旨和战犯谷寿夫的"申请书"呈送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及参谋总长审批。4月25日，国民政府以防字第一〇五三号代电批复：

"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讯明确，原判以法从严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望遵照执行。"⑨

4月26日上午11时，将战犯谷寿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天早晨南京人民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街道的两边和刑场的周围，观看这"魔鬼"的下场。

事后不久，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暴徒向井敏明、野田岩、和屠杀南京同胞300余名的刽子手田中军吉进行判决：

"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在作战时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

这些嗜杀成性的刽子手，最终被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落了个应得的可耻下场。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试谈篇目的科学性

——关于《南京市志》基本篇目的几个问题

杨之水

作者：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一）

篇目是志书的设计蓝图，是修志的首要问题。它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指导思想。谈到指导思想，似乎是“老生常谈”：应该坚持改革，努力创新，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出一部新型的社会主义时代城市志书。在实践中，也常提要抓几个“特点”（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几个“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等。这都是对的，但是，方志要创新，“新”在哪里？关键又在哪里？总是体会不深。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关系到指导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方志的一个基本质量标准所在，其关键是看我们是不是坚持科学性。对此，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得最多，也很中肯。他说，旧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我们时代的地方志应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科学文献”。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但如没有科学为灵魂，来指导制订篇目、取材成书，质量是不能保证的。

怎么坚持科学性呢？首先和主要的，仍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我们今天编纂新型城市志的指导思想。它是实实在在的，贯穿修志全过程的。回顾前两年编纂《南京简志》的实践，体会到这个指导思想实在太重要了，从发动组织、设计篇目到总纂成书等八个环节，无一可以片刻离开这个指导思想；哪里体现得好，哪里就较科学，哪里忽视这个指导思想，哪里就要发生问题，甚至会回到编纂旧志的老路上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这是当代修志特有的强大优势。一定要认真地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并依据党的现行方针、路线和政策，认真研究新志的体例和篇目。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自觉，往往就事论事，经常围绕旧志的体例和篇目议论，思想束缚得很。显然，这样设计出来的篇目，就难有科学之言，创新之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各门科学。它要不断以各门科学的成就来发展自己。我们虽不是写科研著作或编科学教科书，但是作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包括为各类事业、各门科学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新志，也决不能离开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来发展自己，编出社会主义时代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的科学文献。我们要不断汲取各门学科的新成就，采用各门学科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来丰富自己，并制订好篇目。其中，要更好地学一点城市科学，包括城市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这些亲近的兄弟学科；城市志和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总之，要使我们志书具有“比较低水平的科学化”（胡乔木），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二）

城市志首先要认真反映城市的全貌。这是由城市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整体就是系统，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由众多因素、众多层次、众多子系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利用为特点，以聚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目的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的空间地域系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实体。在这个由各种作用不同的多目标、多层次的子系统和支系统组成的城市整体中，看来子系统是局部，但都在城市整体上产生影响，影响城市的整体行为，都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因而认识现代城市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系统、综合的观念。作为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百科全书”，反映城市的各种现象，应是为了反映城市的整体，从宏观上考察城市的总貌。我们按事物性质和现代社会分工进行科学分类，建立篇目的分类体系，也是为了认识各类事物、各类现象在整体中的地位及功能、作用。这样就使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达到辩证的统一，使历史的统一性与历史的多样性达到辨证的统一。

怎样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映城市的整体和总貌？应从纵横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反映。就是既要纵向排比，考察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又要横向排比，考察各类事物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即把历史和现状、时间和空间、广度和深度结合起来分析和综合，才是科学思维的基本过程和方法，也才能合理地制定篇目。一句话，我们的志书需要反映历史发展的纵剖面，又要反映时代的横断面。但是从总体来看，也有主次之分；应以横为主，以纵为次。因为要反映城市的整体，做到门类齐全，首先就要横向排比清楚。对现代城市结构中众多复杂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如不通过横向排比逐项考察，怎么能看出城市的总貌及其发挥的多功能？又怎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发挥志书的社会功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所以，以横为主，先把门类横排清楚，然后展开层次纵向说透，是较合理的，应视为新志体例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是不是回到旧志的老路上了？不然，旧志强调一味横剖，“志体横看”（章学诚）缺乏科学性。从我们南京现存的几十种旧志来看，虽有某些优点，但是篇目安排上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把处于动态之中有较复杂的系统，分割成各自孤立的门类，“老死不相往来”，看不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历史的有序性。二是缺少层次分类，不能多层次地反映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且“因果之效不彰”。三是根据剥削阶级需要谋篇布局，或者是有多少材料设多少门类，很多重要内容（如社会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不予反映或很少反映，片面性极大，根本看不出历史的整体性和广泛性。结果是纲目不清，漫无统摄，实难说是科学。当然，旧志缺乏科学性，有其社会、阶级和认识上的根源，我们不去苛求。但是今天编修新志，针对这些弱点，科学地进行横向排比，以反映城市的整体和总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设计市志篇目时，尽量做到不缺项。如同规划南京这个综合性大城市一样，在内容上不能有缺项，以扩大城市规划的广度，冲破条块约束，打破违背客观规律的封闭局面，从宏观上、总体上正确开展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

南京市地方志 dtz.nanjing.gov.cn

并科学地指导和控制单体设计的完整要求。目前不少部门为了开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做了不少调查，而汇集整理完整资料的这个繁重任务，已历史地落在当代修志工作者的肩上。我们应当“博采详志，注重实用”，“广辟类目，注重科学”。特别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新产业、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不能因为疏忽而出现缺项（前一段我们编的《简志》就因某些缺项，引起一些部门强烈不满，已尝到苦头了）。这次我们设计的篇目，主观上不滥更不缺，尽其所有，无所不包，初设71个专志，加上总类，附录等，初排1135万字（计划成书时控制在1000万字左右）。同时也从实际出发，照一定比例安排篇幅，不要因为过分强调重点，致使篇目悬殊过大。在1135万字中，经济基础部分505万字，占44%，上层建筑部分370万字，占33%，总类、地理、社会、人物等255万字，占23%。是否得当，还可进一步讨论。

当然，以横排为主，也不能一刀切。在《南京市志》篇目中，我们没有把一些根本性质不同的事物，勉强拉在一起，一律实行横排。如在《政务志》中就把古代近代的政务机构和现代政务机构列为前后两章。还准备在修改时把《公安志》等分建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设章。有的同志说，这样摆脱不了“三小块”（即古代、民国时期、建国以后），缺乏横排的传统概念。我看不能硬套传统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宜横则横，宜纵则纵；只要能反映整体，使篇目符合纲举目张，层次分明的要求，是应当允许的。

（三）

如何反映城市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新编城市志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城市具有的共性是，它聚集了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具有多种特征和多种功能，是以经济实体、社会实体、物质实体等组成的综合有机体。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的：“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认识这些共性，对于新编城市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同中有异，我们的任务是反映南京这个城市的个性和特点。怎样反映？我们认为，首先要从南京优势最大、影响最大之处，尤其是从南京在全省、全国的重要地位、作用来看南京特点。

南京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工业基础雄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石化、电子、机械和建材工业的生产基地之一；市区工业总产值，在全国三百多个城市中名列第七。尤其是作为全国特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几年来，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第二、南京是我国四大港口城市之一，有全国内河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并有五种方式（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齐全的综合运输体系，为我国重要的江海水陆联运的交通枢纽和通信中心（全国六大通信枢纽之一），特别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已成为联系的纽带。第三、南京的辐射区域范围较大，是长江流域四个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为苏皖赣近百个市县的经济中心；除京津沪穗四个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外，与重庆、武汉等同为几个跨省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之一。第四、南京是国际知名的十朝古都，在解放前后都曾是全国的直辖市，现在是江苏省的省会。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加上山、水、城、林融合一体的景观，并有绿色城市、卫生城市美称，为南京发展旅游业提供极为良好的条件。第五、南京素为人文荟萃之地，现为我国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拥有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数量居全国前列，有全国最重要的电子、化工研究中心和地学研究基地。第六、龙盘虎踞的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南京市域有全国省会以上城市所少见的丰富多采的矿产资源，其中以金属矿和建材资源最为丰富，并有全国最大的锶矿；铁矿、铅锌矿的蕴藏量占全省的90%。根据这些特点和优势，国务院于1983年11月《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要通过“建设和改造，使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经济繁荣、文教科技事业发达、环境优美、有古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市委、市政府也据此提出发展战略，要求把南京建设成为具有古都特色的、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工业港口城市。

南京这个综合有机体，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经济结构还不尽合理，第三产业还不很发达。中心城市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区域社会服务中心，第三产业应占主导地位，而南京市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整个劳力中只占三分之一左右。重型工业结构和军工部门众多虽有优势的一面，但深度和精度加工不够，比起轻型工业结构的城市，经济效率不高。农村经济结构更不合理，特别是乡镇工业不够发达，郊县经济被称为江苏省的“第三世界”。条块分割还较严重，加上部省属企业特多（其总产值在全市的比重，居全国大城市的第二位），使城市缺少独立的经济管理决策权，管理全行业的作用难以发挥。这些情况，都影响城市的多功能进一步发挥，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个性反映共性。正如赵紫阳同志说：“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城市的多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反映特点时，不应忽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

根据对南京市特点的粗略分析，我们在设计篇目时，注意强化了这些方面：一、经济部分，包括经济管理、工业、交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共设31个专志；其中以工业为重点，共设14个专志，140万字，占全志的12.3%。内化工、石化、电子、仪器仪表、机械、建材等支柱工业设6个专志，80万字，占经济部分16%，为工业部分的57%。农业虽少，只设7个专志，50万字，占全志的4.4%，但因其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城市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市志必须反映正在探索工农结合、城乡一体化新路子的情况，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资料。我们坚持这样做（如何具体反映市管县的内容，将另文说明）。经济部分不仅份量较重，还为了反映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内容，在多数专志中设“管理体制”一章；在工、农、商等专志中除管理体制外，又分设所有制、结构等章。二、历史文化名城部分，特别给《建置志》和《文物志》较多的篇幅（30和40万字），分别设章，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古城特色（如南京特有的“历史城垣”、“六朝石刻”等都专门设章）。还设《地名志》以反映古都南京地名的演变、考证、传说和研究。其他如园林绿化、教育、文化艺术等专志也设章注意反映。三、文化部分（教科文卫体和新闻出版等）分设12个专志，255万字，占全志25%。其中教育、科学初定各30万字，以后还可酌情增加些。

认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不能不进一步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规律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部贯通古今的城市志，必须通过记述南京这个城市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来反映建城设都的基础和条件，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所体现的几种社会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等），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所起作用等等。我们的城市志更要通过记述建国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来反映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基础的客观规律，反映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要抓住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十年（《南京市志》下限至1988年，正好是改革后的十年）这个建国后最好的关键性时期，透过城市功能、作用、地位等现象，透过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人们思想观念等变革，来反映正在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认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当然，这些是就一般规律而言，各类事物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必须通过它去反映一般规律；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互相联系着的，这里不细说了）。很清楚，我们编出的城市志如不能反映规律，就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就不可能是科学文献。但要反映规律就必须对丰富的资料深入分析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要求编纂者在记述时做“有心人”，善于“画龙点睛”，把大量的资料与准确的论断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也要考虑一个便于集中反映和阐述规律的体裁。黄炎培在民国年间编的《川沙县志》，在各卷之前特设“概述”，应是一个好办法，较之旧志可谓创新。但有不足。我们借鉴黄志做法，并做适当改进，要求“概述”既要体现内容的整体性，又要提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使之总揽全局，纵横贯穿，分析特点利弊，反映客观规律，做到鉴往明今。为此，我们设置三个档次的概述：一是“总述”，以为全志之纲；二是普遍在分志之前设“概述”；三是少数重点专志设“综述”，便于进行较充分的分析与综合。如经济管理的“综述”，就要求在宏观上既能横向地反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互为影响的几个环节，又能纵向地反映经济管理各个阶段的特点，着重阐述运用经济杠杆和其他经济管理措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验和规律。

（四）

最后，就《南京市志》平列设志问题再谈一些看法。

现在市志篇目，多为篇下设志，即二级设志。我们决定平列设志（有的叫平头设志），即一级设志。就是在市志的宏观控制和总体要求下，设71个相对独立的专志（不含总类和附录），共计30分册，陆续定稿出书；专志出齐，市志也就基本上大功告成。这也是我们市志编委会主任、市长张耀华同志多次提出来的：编修市志这样浩繁艰巨的工程，必须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改变由少数人搞的老方法，不要什么都抓在自己手上。我们认为，平列设志，放手发动群众分别编纂相对独立的专志，好处至少有以下五条。一是有利于众手成志，保证质量。发动和依靠众多的修志人员和专家学者，从制订篇目、搜集资料直至总纂定稿，付印出书，一包到底，总比由志办几个“秀才”，把大家送来的长篇或初稿总纂定稿的做法，高明得多。而且志办没有一个通晓百科的“全才”，外行改内行的稿件，质量没有保证（至少是容易发生差错）。二是有利于加快修志进度。多数部门有了责任感，力争早出专志早见成效，就要设法创造条件抓紧修志。如把数百成千的修志人员强拉一起同步进行，势必欲速不达，估计十年也难完成（我们计划整个市志编纂任务于八至十年完成）。还因先起步等后动手的，也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三是有利于志办专职人员腾出时间，加强理论研究和检查指导工作。目前志办人少事多，疲于奔命，只有彻底改变此种现状，争取一些学习时间，努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才有可能保质保量完成修志任务。四是有利于节约开支。现在不少单位都有两套打算：先按志办计划拿出资料长编给你删削总装，再按本部门需要出一本“小而全”的专志。这种做法岂不劳民伤财？我们为什么不能变两套为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一套以减少浪费？变为一套，兼顾两下利益，可能市志字数比原来设想的有突破，但比两套来说还是合算的（其实字数多少，当以充实和精炼为原则，否则不予批准）。五是便于成书后读者查阅。好比一部二十五史，需要看哪个断代史，完全听便。在现实中从头到尾精读二十五史的人总是少数。一部大城市的志书，即使少到只有五六百万字，恐怕也难找到几个通读、精读全志的读者吧？当然，这要求方志更加注意资料编排科学，门类清楚，好象类书一样，便于读者寻检、征引才行。

有的同志说，搞相对独立的专志，就会“小而全”，容易“闹独立性”，岂不自乱体例？我们认为，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在条块分割下形成的“小而全”，这是长期忽视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弊端之一，是影响城市向多功能发展的一个障碍，也是我们在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城市整体中的各专业（包括各产业、各行业），都有自己分工的专业范围。我们各个专志都必须认真反映自身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对有关专业和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反映一个专业的内在要素及其相关联系，必须是“全”的。志书中这种所谓的“小而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和经济体制中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小而全”不能混同起来。至于所谓的“闹独立性”问题，只要宏观控制，即有统一体例，包括指导思想、编纂原则、质量要求以至版式的规定，是不愁会“闹”起来的。其中主要有些内容和体裁，如大事记、人物传等，各专志是否可搞？这些可以考虑：是否可设大事年表，以纵向反映本专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也设本专业的人物简表，以反映重要人物对本专业的影响；也可设置编后记，说明本专志的编纂始末？它们和全志相比，更“专”一些，专业特点更为突出一些，而全志的大事记和人物传则源于各专志，高于各专志，更为集中。总之，以改革精神来设计新型的城市志，我们在这里能否突破一点，来个“微观搞活”？这些是可以根据实践情况研究确定的。

也有的同志说，搞相对独立的专志，搞不好一些内容会打架，难以处理交叉重复问题。我们认为，事物之间的分工是相对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则是绝对的，因而各专志之间出现交叉是必然的。而今天志书正要“力求表现出多门类的相互关系”（胡乔木）。所以交叉渗透，不能视为重复。我们的原则是：要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适当照顾部门的实际需要。做到既要事以类从，行业归口，又要各有侧重，详略互见，详主略次，同中见异。具体情况当然要具体区别处理：有的应正面设目着重记载，有的是侧面局部记载，有的只在宏观记述时交代一下，有的关系不很直接的则可不记。例如，科研的记载对象可以囊括所有的专业科研，那么别的专志，还写不写科研？我们就这么处理：科学技术志主要从宏观上反映科研，各专业的科研则由各专志具体记载。这样，既反映各门类的相互关系，又便于取材成书，岂不是两全其美。当然，客观情况更为复杂，还有一些交叉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尚待探索。

完成编纂南京市志这项内容浩繁，学科众多，结构复杂，纵横交错的巨大的系统工程，无疑是一项艰难繁重的任务。但是有利条件也是不少的。除有市委、市政府重视和支持这个基本条件外，南京修志事业本身也已具备一些条件。这就是，南京的修志战线经过几年的努力，出了一些“短线产品”：编纂出版了近130万字的《南京简志》；去年开始编纂出版了《南京年鉴》；编辑出面向世界的文图并茂的大型历史名城丛书《南京》；还坚持编辑出版双月刊《南京史志》已四年多，不仅全国公开发行，而且受到一些外国人士的欢迎。特别是用两年多的时间

dfzhanting.gov.cn

秦淮之名何时有

乐华云

秦淮河，是南京古代文明的摇篮，也是南京兴衰起伏、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今天建立的秦淮风光带，展示了新的风采。“蒋山青，秦淮碧”，人们多年的愿望将成为现实。但是秦淮之名何时出现，至今还是个待研究的问题。现在以唐代出现之说为多，不少人以杜牧《泊秦淮》为例证，《南京山水地质》(地质出版社1979年10月)一书就说，《泊秦淮》是“最早出现‘秦淮’的记载”。

笔者以管窥之见就教于专家学者：我以为秦淮之名于东晋已见端倪，而在南朝则较多出现。据《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废帝太和时（366年—371年）侍中王坦之造临秦、安乐二寺。清陈作霖在《金陵通纪》里也写到：太和六年“侍中王坦之复造临秦、安乐二寺”。后来的《首都志》、《金陵古迹图考》等书也都作了同样的记载。安乐寺就是古代画家四祖之一的张僧繇画龙点睛典故出处所在。而临秦寺则透露了秦淮由来的信息。从地名研究角度来看，我国临近河流而得名的县是不乏其例的，甘肃的临夏县，河北的临漳县，山西的临汾县，山东的临沂县等，它们得名的原因都和湖南的临澧县相同，据《水经·澧水注》载明，因“临侧澧水，即为县名”。临秦寺也是如此，据《建康实录》讲，因该寺“在今县南二里半，南门临秦淮水”而得名。试问，当时如果只叫淮水，不又叫秦淮的话，寺名也就应该叫“临淮”寺了；可事实是叫临秦寺，说明秦淮之名已经存在。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证。《太平御览·地部》引自《舆地志》：“秦始皇巡会稽，凿断山阜，此淮即所凿也，亦名秦淮”。秦淮之名完整出现。当然，说淮水是秦始皇所凿，是不正确的，《建康实录》和《六朝事迹编类》都指出：秦淮“分派屈曲，不类人功，疑非秦始皇所开。”事实上秦淮河是一条自然河流，不是人工河。《舆地志》为顾野王所著，顾生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卒于陈太建十三年（581年），距今1400多年。《舆地志》是上承汉魏下至梁陈、隋代以前的一部地理总志，宋时尚存，曾为《初学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书大量引用。

唐以后，秦淮之名出现增多。以诗文为例，李白在天宝九年（750年）作《留别金陵诸公》诗，其中有“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天宝十二年（753年）作《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诗，又提到秦淮。同年，李白游广陵，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二人一见如故，同舟游金陵，然后别去。别时，互相赠诗。《全唐诗》仅收了魏万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在与李白分别时所作，题目叫《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诗中有“同舟入秦淮，建业龙盘处。”再次提

编出的《南京简志》，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重视，认为“做了一件好事，很不简单”。尽管这部志书还较粗糙，存在不少疏漏和错误，但是广大修志同志在没有先例，无可借鉴的情况下，“逢山开山，遇水搭桥”，克服困难编修社会主义新志；而通过编修简志，也培养了修志人才，摸索了修志经验，积累了一些资料。这对今后编修大型的南京市志，心中就比较踏实了。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到秦淮。许嵩在唐至德元年（756年）撰写的《建康实录》也多次提到秦淮。如“古老相传，方山西渎江土山三十里，是秦始皇开，又凿石硊山，西而疏决此浦，后人因名秦淮也”；“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县”；“初，王敦构逆，导忧覆族，使郭璞筮之曰：‘……淮水绝，王氏灭’，……淮，即秦淮也。”据《晚唐诗人杜牧》一书记载：杜牧从大和七年（833年）到大中五年(851年)，前后七次来金陵，《泊秦淮》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具体写作时间虽不详，但不论怎样，上述李、魏、许写的诗文中提到秦淮的时间，比杜牧《泊秦淮》要早80年到100年。由此可见，即使在唐代，《泊秦淮》也不是“最早出现‘秦淮’的记载”。当时秦淮与淮水还是并称的，如李白《登瓦官阁》诗中写到：“钟山对北卢，淮水入南荣。”

那么为什么六朝正史中，只称淮水，而不称秦淮呢？我以为与“王气”之说有关。东南有王气之说，始著于秦；金陵有王气之说，始于孙权的谋士张纮。他说，金陵有王气是“天之所命，宜为都邑”，这显然是为孙权称王做舆论准备的；而金陵有王气，并且与秦始皇凿淮水联系起来说的，则是东晋孙盛的《晋阳秋》，该书写到：“秦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秦始皇改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堑即建康南淮也。(今谓之秦淮)”（转引自《太平御览·地部》）可见秦始皇凿淮水的传说，至少是晋代就有，并非象《南京山水地质》所说的“始于唐朝”。王气是古代迷信的说法。既然秦始皇凿淮水是为泄王气，这本是不吉利的事，难怪六朝的帝王都要忌讳“秦淮”，正史里也就不提它了，只提淮水；到了隋唐就不同了，统治者一直采取贬抑金陵的政策，从隋文帝犁庭，到唐代旧传秦始皇凿淮水的盛行，都是一个意思：“金陵王气黯然收”。所以，唐代以后，秦淮之名增多，宋代则普遍采用，并且逐渐取代了淮水。可见，秦淮之始早矣，它与紫金山齐名，成为古都南京著名的一处胜迹。

《方志研究》 欢迎订阅 欢迎投稿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主办的《方志研究》，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文风，研究修志理论，探讨编纂方法，交流修志经验，传播修志知识；团结同行师友，服务修志事业。主要栏目有：理论探讨、编纂方法、修志经验、方志评论、学术争鸣、主编论坛、志坛信息、志德修养、方志史话等。

当前，主要报道内容：怎样理解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如何保持地方志的色彩？新方志的功能应当怎样表述？对过去提出的“资治”、“教化”、“存史”的概念如何理解？如何提高志书的科学水平，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怎样理解和执行“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继续编写地方志”的原则？怎样避免志书“政治化”倾向，不要宣传色彩，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要求志书体现客观规律？怎样练就用事实（资料）来体现规律、彰明因果、褒贬是非的笔功，坚持述而不论的写作原则？等等。

本刊为16开本，80页，双月刊。

（一）每本单价1元，全年6元（含邮资），不破套订阅。（二）通过邮局汇款。订户来款务必写清地址、姓名、标明刊名和年度。（三）收款单位：长春市新发路11号，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经济纪实·

作者：早年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现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94岁。

爱字棉种在我国落户经过

邵仲香

我国自解放以来，平民翻身做主，渐次的知道改善生活，也研究富美观念。不说别的，穿着方面，我们自纺自织的粗老布，渐次的人们不喜欢服用，而喜欢厂商所织成的细布，（过去称洋布）。这件事看来好像很平常，算不了特别的大事；但是研究起来，关系实在不小；要知道过去这洋布的原料，都是从国外用金元买来的，我国每年所受的损失，不知道有多大。

人们不禁要问，“我国各地所生产的棉花，不是现成的吗？何不用来生产，而偏要进口的棉花？”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土地上原来所产的棉花，乃属于另一品种，即使像江浦、乌江一带有名的“乌江卫花”也多半是织地粗、纤维短，只合织成土布。虽然也有织地较软，纤维较长的品种，杂乱在大地内，但都杂乱不纯，未经选种培育，不能用它纺出“高支头”的细纱，没有细纱，何能织成精美的“洋布？”

1915年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感于用美金向美国购买长绒棉花，不但经济外流，且运输亦多有不便。何不在我国土地上，栽种长绒棉花，自产自销较为经济而便利？他们就向美国棉业专家柯克(O.F.Cook)求教。经柯克把八种美国长绒棉品种在中国多处试种，他发现多数品种，都长得奇形怪状，不成样子，唯有“阿开拉”(Alcala)和脱里司(Tuice)两品种，能以生长较好，它们虽有一些“劣象”发生，但如能精心“去劣”这品种是可以在中国风土上保持种性的。

1917年，柯克又介绍了棉业专家郭仁风教授(J.B.griffing)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以阿开拉和脱里司为基础，在中国土地引种长绒美棉品种。从1917年开始精心培育驯化了这两个品种，抵1919年经过三年的时间南京大学农学院培育成长绒的“爱字美棉”和“脱字美棉”。并且从1920年开始在乌江棉区推广了“爱字美棉”。

上面提到郭仁风教授，花了三年的时间，把长绒美棉“阿开拉”培育成“爱字美棉”，安定其种性，便可到别处去安家落户。郭教授认为距南京较近的乌江（今江浦及和县境内）是推广“爱字美棉”的理想地方。

谈到推广有人认为：“这是把好东西送给他人，他人必定是乐于接受的”。事实上农业推广并不如此简单，且看这位推广爱字棉的热心人李洁垒推广爱字棉的经过。李洁垒是金大农业专修科毕业生，没有特殊的技能，但有一颗为人民做好事的热心肠。1920年春受了任务以后，便准备了若干标本图表等等的推广材料，独自到了人地生疏的乌江镇上，落脚在基督教的礼拜堂内，像挂单和尚一样。经牧师的介绍，向当地一些农民，宣传“爱字美棉”的好处。

“种棉花”是乌江农民的老本行，而况“乌江卫花”是他们的命根子。“爱字美棉”如何，不妨用来一试，比比看！经过李洁如的劝说和保证，居然有十来家农户愿意冒险试种，但言明只在地角边拐种它，不侵犯他们“命根子”的大地生产。

南京市档案馆 dangjing.gov.cn

话都谈妥了，“爱字美棉”的棉籽都用小袋装好发给了。农民仔细地看了种形整齐肥大，可以料到下到地内，发芽肥壮；如能把它吃到牛肚内，必然使牛肥壮起来。当下无话，李洁如为人和善，很是心安理得，虽不为大功告成，但总以为是个“好起头”。

枣树发芽，是栽种棉花的时候了。李洁如忙着下乡拜访那些接受爱字棉种的农民。不料发现他们多数失了信用，棉种都未下地说棉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他们不好意思说用来喂牛了）。

幸好！还有两家在他们的地角上，种下了所发给他们的“美棉”种子，而且发出了绿油油的肥状幼苗。李洁如看了十分高兴！这两户农户也似乎高兴。但是经不住其他农民散布的谣言，吓得他们连夜偷把乌江地区仅有的几棵美棉苗砍了。一年的推广，一棵“爱字美棉”也没有在乌江安家落户。

李先生气极了，却无办法。闷了好几天，但终于被责任心战胜。他认为凡事不能单用嘴来服人，必得要有行动。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走走。

乌江镇南头，有两座庙，一座是项王庙，另一座是空庙。不知是什么缘故，内中有几个东倒西歪的菩萨，也没有和尚或其他人去理它。这庙的地点倒不坏，位于乌江镇的当头。李先生商得地方同意在这里办起个平民小学来。他把这地方清理了一番，动员农民自带桌凳，没费事居然济济一堂。

李先生很会教书，上午他教写读算，是个单级小学；下午他就带学生劳动，把学校前后左右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碎砖石子堆在一旁，让出许多空地来，并反复地把土地翻晒着，临时种些蔬菜，等菜长大后不时的给学生带回家中，孩子们和家长，都很欢喜，说先生和学生都很有用。

1921年春暖花香时，农民忙着种植他们的“乌江卫花”，李先生也带同他的学生培种他的“爱字美棉”这事惹起几个学生家长的意见：“我们子弟，在家也能学种棉花，何必到学校去学？”李先生却说：“我们何妨来赛一赛！”更鼓起学生的干劲。

气候渐次地暖和了，农民的“乌江卫花”发出嫩黄的仔叶；学校的“爱字美棉”则是叶粗杆壮，显然胜过他们的土种。待至棉花长大，更惹得一些农民前来仔细观看。他们看到这棉株型紧凑，高矮适宜，果枝低下，铃间长短相宜，有经验的老棉农说：株型松紧适果株低下，铃间长短适宜，皆是丰收的象征，这种棉花必定高产。

这年秋天，棉果裂开了，有一奇怪的情形被发现：爱字棉的花托向上翻着，能托住花絮，使其能挂在托上不致落到地上弄脏。这就给收花以极大的便利，不必随开随拾。越是有这些好处，愈能吸引农人并受赞赏，甚至多生爱慕之心。

校园内的爱字棉，白茫茫的棉絮，开成一片，都挂在花托上，随风飘扬，远近农民都争来观看，这自然是学生和先生的光彩。学生都闹着要收摘棉花，但李先生主张迟些时再收，让农民们多看看。

“不好了！”几个早起的学生向李先生报告，“我们的棉花昨夜被偷了！”又埋怨老师不让早收。李洁如听了倒不奇怪，反发笑地说：“这些人，好意的送他棉种不要！却来偷，真可笑，看来在乌江推广‘爱字美棉’，是时候了。”

此后不时有农民来找李先生要爱字美棉种籽。李先生回答说：“让我写信到南京学校去询问，怕今年不肯把这好爱字美棉种籽白白地送人，是要备价去买的。谁要多少？在我这里登记。”当时农人都抢着登记，一次就是四担多。1922年爱字棉花获得大丰收。“爱字美棉”开始在乌江安家落户了。由于爱字美棉纤维长，弹花工弹不开，反说它“不是好货”。有的商贩借机杀价，农民们丰产没有得到实利。到底李先生是个“有心人”，他把乌江的爱字棉，搞了些样品送

沧溪三元观联漫话

李遵澳

留白鹿遗踪，
庙垂千古；
溯赤乌①霸业，
观号三元。

三元观位于高淳县沧溪镇东，永丰圩东北埂外高阜处，距县城西6公里。历来不少文人雅士曾来此赋诗作文，遣兴抒怀，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特别是三元观的大殿和戏楼，撰有很多名联，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副。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清康熙进士张自超瞻仰遗迹，状景抒情。上联“留白鹿遗踪……”是通过怀古，遥忆永丰圩的史实。据民国七年《重修高淳县志》载：“宋《溧水志》：政和②五年十月，上③阅李白《游丹阳湖》诗，因询蔡京，京言：升州④溧水管，三湖⑤相连，其中高阜处可围湖成田。上遂诏集建康、上元、江宁、句容、溧水五邑民夫，命将军张抗督筑。值冬雪盈湖，有白鹿行踪之异，缘蹊其迹而成之。计程八十四里，内筑穿心一字埂，分为上下两坝，名曰永丰圩。”当时湖水深浅不易测定，冬雪盈野更难定界，但依白鹿行踪筑埂，是排除障碍确定高阜处的妙法，是合乎科学原理的。上联用生动形象的描绘，歌颂了先辈当年围湖造田的艰苦历程中所表现的勤劳智慧和富于创造性的英雄气概。今日我县人民每谈及永丰历史，无不将“白鹿遗踪”传为佳话。……“庙垂千古”是说明三元观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一雄伟壮丽的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漫游于此，令人倍增怀念。

下联“溯赤乌霸业，观号三元”是追溯三国时的吴大帝胜黄祖，破曹操，定都建业⑥称帝江东的业绩及建观的年月、命名。据早年出土的碑文记载，三元观相传建于三国时吴赤乌二年(239年)。清雍正年间，文人谷起风在《沧溪三元观》诗中，曾有“石碣镌年记赤乌”的诗句。我国清代著名的桐城学派方苞在《三元观记》中云：“按疏记：汉末吴将周瑜驻屯于此，瑜殁，权立观以褒其功。”可见三元观是汉末吴国孙权为表彰吴将周瑜的功绩于赤乌二年兴建。这一联不仅构思灵巧，对仗工整，而且使人瞻仰古观，缅怀往事，油然而生追慕与思念之情。

如今，永丰圩是江南历史较早的圩区之一，是我县的首圩，又是江南负有盛名的鱼、米、菱、藕之乡。三元观戏楼是一座历史悠久、工艺水平较高的砖木结构的殿宇式古建筑物，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①赤乌，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的年号；②政和，北宋徽宗的年号。政和五年为公元1115年；③上，指宋徽宗；④升州，唐置，宋沿用。今属南京市管辖。当时高淳属溧水；⑤三湖，指丹阳石臼固城三湖；⑥建业，孙权称帝时的国都所在地，即今南京市。

到上海纱厂里去，打听市价，上海纱厂最初认为不是“真货”；如是真货，他们愿意以美金作价收买。李先生于是把乌江所有种爱字棉的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的爱字棉产品集中起来，打包运到上海纱厂去卖，所得价款，除去一切运输开销，他们的所得比起乌江本地商贩所给的要高三成还多。这时上海纱厂也主动约定，此后乌江的爱字棉，每年由厂方派专人前往坐庄收价。从此爱字美棉不但在乌江安了家立了户；乌江的合作社、轧花厂也大大地发展起来。此外还办起了实验农场、学校诊疗所等，成了农业推广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钟山之英 草堂之灵

——南京钟英中学的创建与发展

山岩

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从创办到1956年收为公有（收为公有后改名二十三中学），计有51年历史。这所从光绪末年开办，艰苦创业几十年的私立中学，在南京教育史上广为人知，颇有影响。

钟英中学是蒋长洛(号森书)、曹秉仁(号家麟)、顾琪（号花岩）、伍崇学（号仲文）、辛汉五先生，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即公元1905年2月19日。办学的宗旨是“纠合同志，提倡风气，以教育普及，人才日多”，“所授普通各学，办求精深完备，以毕业后可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及养成完全之教员为度。”①创办初期校长是曹秉仁先生，而学监则是顾琪先生。蒋先生是董事长，为钟英提供资金，连校舍也是“暂借户部街蒋氏别业”②，并指择花牌楼（今人民剧场一带）蒋家地产筹建校舍。

钟英中学的取名，也经过一番斟酌。此名有两个意思：一是借《古文观止·北山移文》篇中的“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句中“钟英”二字，表示钟英脚下育英才之意；二是钟山在三国时曾名蒋山（为避孙权父孙钟名），取名“钟英”含有蒋氏所办之意。

钟英中学开办迅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望日（十五日）出版《章程》，次年正月十六日就开学。确定上学期至六月初六，下学期从七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招收中学预科两个班，自初小毕业入，学制三年；中学本科两个班，自高小毕业入，学制五年，计120人。学校招收回民子弟，并尊重回民习俗，规定食堂不食猪肉。住宿生、走读生并收。学校统一服饰，设备齐全。课程本科设有修身、读经、中文、英文和日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图画、唱歌、体操，每周34课时；预科开修身、读经、中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体操，每周28课时。学校的教师，皆聘请社会名流。如最早的国文教员是满清秀才端木楷（号雨松）；才思敏捷、教学有方的张洁民；最早的数学教员张紫和、物理教员张可治都是留美学子；物理教员朱善培是留英学子；英文教员是翻译《三民主义》的美国人毕范宇；美术教员萧俊贤是晚清书画家、道人李瑞清的学生，沪宁著名国画家；体育教员是杭州武备学堂出身、老同盟会员李怀诚……。“钟英”的名声很快外扬，第二年（1906年）报考钟英中学的学生陡增，户部街校舍不

南京市第二十三中学 dfz.nanjing.edu.cn

敷使用，学校暂迁中正街（今白下路）孟渊旅馆旧址（今白下医院一带，当时也是蒋家房产）。当时正处辛亥革命前夕，钟英的教员留洋的较多，多数赞同推翻腐政，改革政治。学生们受其影响，追求自由解放。李怀诚老师更是视钟英为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的基地，常常教练军事体操。全校呈现生动活泼、学以致用的局面。1909年，金陵城内小铁路通车，南终点站就在中正街。南来北往的旅客进城必到中正街。他们看到墙内钟英中学秩序井然，一派兴旺，交口称赞。“钟英”的名声很快传遍苏、浙、皖，高门子弟纷纷前来求学。此时钟英闹学潮的风声很紧，蒋先生恐祸及自身，加之社会上流言纷纷，便将“钟英”改为“种因”，断绝一切。后学校又复原名。曹先生虽为校长，很少到校，却派店中会计李左泉来钟英把握财金。每每学校收下的学杂费，先汇给他做生意，然后他再寄回教职员津贴。学校经费困难，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正值此时，两江总督端方前来察校。那天端方换上便装，一早来到钟英，参与学生活动，陪同师生进餐，直到放学时分。在察毕会上，端方大赞钟英成绩优良。李怀诚插言：“好是好，只是经费困难，准备停办。”端方惊奇，说走了很多地方，未见这般好学堂，有困难写公文来，我解决了。于是端方呈请清廷学务部立案，并承江苏省咨议局通过，受省款补助年五百两银，又得江苏省都督府指拨，在南捕厅、北捕厅公署旧址任选一处改建校舍。因考虑北捕厅地处三牌楼，比较荒凉，便接受南捕厅（今内桥南府西街小学内）改建校舍。“辛亥光复，南京为兵争要地，学生先后散去；民国元年，国体既定，复行召集，校务一新”学校及时报请北京教育部立案，并继得江苏省议会补助年五百元。时蒋先生已殁。但学校顾念他资助恩重，一切回俗，仍然沿袭，直到三十年代，学校还并开回、汉两种食堂。此时，曹先生任名誉校长，顾先生正式接任校长。民国二年(1913年)，新校舍落成，钟英迁入南捕厅，直止1954年。

顾校长担任校长后在建设学校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立下校训：勤朴诚毅，使师生行有所仿；二是力建南捕厅校舍规模，添置教具、图书、仪器、卫生器械等；三是在建设教师队伍上，除高薪聘请名流教师外，还规定本校毕业的高材生及上了大学或已工作的，都应到母校任教一门学科。著名的音韵语言学家赵元任、沪宁著名国画家张通之、梁公约，“五四”运动时南京学运领导人之一李庆麟、现南师大宋词专家唐圭璋、中山大学王起教授、北京美术界权威常任侠教授等，都曾在钟英教过书。至于民国以后钟英的首席史地教员丘建中、首席国文教员陈祖同，还有二十年代教数学就著称南京的余介侯，以后的陈重寅、曹仲厚、王子培、陆子芬、梅慕勋等，都是钟英自己的毕业生。至此，钟英中学已发展成南京私立中学中最为正规、规模最大，设备最齐、质量最好的一所私立中学。社会上传有“数理精，进钟英”的赞誉。这期中，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又由四年改为高初中三、三制两级中学，至1926年秋，钟英全部实行了新学制。

1927年，校舍为军队所驻，历三、四月之久，待军队开拔，正着手清理一切，又遇龙潭之役，校舍为俘虏收容所，二十余年辛苦得来之图书、仪器、成绩文件损失一空，校舍亦被破坏不堪。顾校长体弱多疾，力不从心，病辞校长，考虑再三，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李怀诚接任校长。李校长接受了一个破烂摊子，并不气馁，重组校友会，又请出张继、邹鲁、蔡元培、何民魂、吴稚晖、章桐等辛亥元老当校董，修膳校舍，扩建宿舍楼，力整学校规则，恢复教学，使钟英又复旧观。“九一八”后，李校长离校，校务暂由教务主任余介侯、校友会主席陈祖同、市党部谭开云三先生维持。直至1934年，余介侯受社会局委托，代行校长职务。在这期

南京市地方志 dfzhi.nanjing.gov.cn

间，余校长寓教（教学）、训（高中军训）、军（初中童子军）合一制，实行军事管理，使整个学校俨然一军队（按：当时情况如此。于学校、于学生、于社会利弊如何，似可研究）。这时的钟英，所藏理化仪器、生物显微镜架数居市各中学之首，数理成绩跃入全市前茅。1937年，全市高初中数理毕业会考时，钟英的高中总分居市第一名，学生管传倧（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得个人第二名；初中总分居市第二名，学生陈鸣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史副主编）得个人第一名。又因为高中军训、初中童子军都很有名，不少学生考进黄埔军校，社会上又起“要当兵，进钟英”的传谈。钟英发展至此，达一高峰。余校长雄心勃勃，在中华门外五贵里买下几十亩土地，准备开办钟英第一分校。

那时，南京除有外国教会办的两所中学堂外，官办的还只有四所中学堂：一所是储材学堂，是同文馆扩充的；一所是江宁府学堂，是在文正书院的基础上开办的；一所是县学堂，是在惜阴书院开办的；还有一所是在昆卢寺开办的师范学堂。所以，钟英中学的开办，开创了民间办学的一代新风。在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中，虽颠沛流离，几遭战难，但遇乱不散，遇败不馁，始终不受外国教会之扶持，又不为国府之左右。民国时，因学业优异，省议会曾几次想收为公有，均遭拒绝。“九一八”后因校长短缺，市党部曾插足进来，但终未能控制钟英。

钟英中学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几千人才。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欧美各地，知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教授不下五百人。如朱瑞是上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和《解放军将领传》上的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人物传》上也有他的一笔。他1922年在徐州培心中学因闹学潮被开除，来南京钟英中学插班（当时四年一贯制）。曾自拟一篇题为《拟孙文讨伐贼檄》的文章，仿唐人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的笔调，痛斥北洋军阀的暴政，深得进步国文教师之赞许。他还在校刊上发表一篇小说，通过一个不幸青年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只有招牌，没有内容”，要建立名符其实的民国，“还要革命”。④1924年毕业时，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当着督军的面，抨击军阀统治。后来他去上海报考国立广东大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共青团和国民党，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加入苏联共产党。1933年在江西瑞金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后参加长征，来到陕北，专事建设炮兵工作。1948年，他带领炮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在锦州义县部署战斗时，不幸触雷牺牲。中共中央发来唁电，深切悼念这位炮兵司令，表彰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

李国鼎是当今台湾的“经济部”部长。他是钟英1926年的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他就好学善钻，很得老师赏识。中央大学毕业后，考取英庚款留学，专学经济六年。1985年还听说他荣获台湾经济管理奖。还有1932年毕业的胡畏（胡笃冲）同志，曾任河海大学党委书记。他是“九·一八”时，钟英师生抗日游行请愿大队的大队长。其弟胡叔度（胡笃宏）与刘西尧同班，是1933年的毕业生。刘西尧曾任中央教育部部长，胡叔度曾任中国驻刚果大使。刘部长在87年春来探望母校时还回忆说：“当年钟英中学的教学质量就是高，那时市一中就在旁边，但外地来的学生都愿考钟英中学。”

钟英中学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专家学者的更不乏其人。如1987年6月9日过世的西北工业大学黄玉珊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航空、航天力学专家。他少时聪颖，1927年才10岁，就考进钟英中学初三。1931年高中毕业时才14周岁，一举考入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又考取第五期英庚款留学，后又赴美斯坦福大学，获取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年仅23

金陵拾梦

（之二）

三十年代南京的日报

潘子农

我到南京，看到的第一张日报是《京报》，报头用黑底白字，很别致。没有多久，作为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诞生，社址珍珠桥。元老叶楚伧挂名主笔，实际负责的是总编辑程沧波。副刊《中央公园》的首任编辑是向培良，二任王平陵，三任吴某编副刊，自己每天写篇杂谈，标名“自拉自唱”。其时总编辑由赖琏继任，有人写信给他，说“自拉自唱”的下面，还应加“自看自唱”，较符实际。未几，吴某终于下台了。

《京报》停刊后，在其部分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上，创办了《新京日报》。社长石信嘉是湖北人，总编辑段梦晖是湖南人，都很年轻干练。该报编排新颖，思想也比较活泼。副刊《雨花》由段梦晖兼任，他和张长弓关系密切，常有文章发表，文笔犀利。每周有两三天让出《雨花》篇幅，邀约各方附编专门学术性的周刊，如中央大学社会系师生主编的《理论与实际》，开展文艺社主编的《开展》周刊等。

《新京日报》最初的社址在卢妃巷（今洪武路），三进三开间的平房，虽陈旧而极幽静，离头道高井甚近。我经人介绍和段梦晖相

岁。多年来，他早已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从1939年起，在英国一级航空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内容丰富而广泛的50多篇论文。他是我国旧飞机疲劳定寿、损伤容限评定和新飞机损伤容限设计的创始人之一，在开创我国运载火箭结构强度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有1937年在钟英初中毕业的吴良镛同志，现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则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同班同学赵继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是世界有名的力学专家。至于国内外各大学、研究所中的教授、主任研究员等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屈指难数。钟英中学的老校友们都以他们曾就读钟英中学而骄骄、自豪。他们深爱并怀念在钟英中学的学习和生活，称赞母校无愧于“钟山之英、草堂之灵”的光荣称号。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第二十三中学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

注：

①《南京钟英中学章程》；②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南洋官报》；③1937年钟英高中毕业纪念册上简史；④《中共党史人物传》十五卷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识后，每于晚间去该报编辑部闲聊，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我也为《雨花》副刊写过不少文章。

大约1931至1932年之间，石信嘉得到经济上的支援，将社址迁至二郎庙两层新楼。楼下设有发行部，隔壁是南京当时最大的家具商店，店面甚宽阔。楼上是采访、编辑两部和会议室，焕然一新，石自己还有了小轿车。与此同时，还邀请他的北大同学黄某担任经理，筹备出版《新京画报》，由洪正伦编辑，委托上海文华图书馆代印。每半月一期，随报附送，这在南京新闻界尚属创举。可惜只出两、三期，便因不胜负担而停办。

《新民报》是代表四川地方的报纸，创办人陈铭德精明能干，颇有见地。编辑部的主要人员，除初期的张友鸾、张慧剑等少数以外，大部分都是川籍。副刊《葫芦》的主编金满成，与其夫人陈凤兮，原是上海的青年作家，有一定的号召力。（解放前夕，满成在上海《申报》写过一篇关于陈毅元帅的连载文章，甚受欢迎，后回重庆，情况不明。）那时聂绀弩隐蔽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常为《葫芦》写稿。

社址原在明瓦廊，新都电影院建造时，陈铭德投入资金，在影院隔壁同时建造单开间的三层楼房，作为《新民报》的新址。地处繁华中心的新街口，霓虹灯招牌闪耀街头，气象万千。这时的总编辑是年轻的赵承继，为人谦和，工作认真负责，很注意头条新闻的大小标题，往往清早遍阅各报，研究同一条新闻到底如何标法。副刊也有多种，阳翰笙主编的《新园地》是最基本的，每周刊出次数最多。施白芜主编的《南京版》专门介绍本地风光，每周两期。还有曹孟君与谭惕吾主编的《新妇女》和我主编的《戏剧与电影》，均为周刊。

稍后一些，南京出现三份四开型的日报，各有特色。王公弢主办的《朝报》，其本市新闻版反映敏捷，着重趣味性。副刊邀来上海小报界著名的陆小路主编，共两个版面，能使雅俗共赏，而高龙生的漫画，又为之生色不少。该报的格调可说属于“海派”型的。

以天津报人唐季青、许君武为主力的《扶轮日报》，是津浦铁路局的机关报。它的新闻内容，编排形式，乃至副刊的选稿，都代表着“京派”的风格。叶浅予主编的画报，单凭他的连环漫画《王先生别传》，就深受读者的喜爱。该报在津浦路的列车上大量发行，南京市内也有不少的读者。

由所谓“南京三张”的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合办的《南京人报》，确实是一份散发着道地的南京泥土芬芳，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所热爱的报纸。清早你到夫子庙前奇芳阁、奎光阁等茶馆去走走，那些一边品茶，一边尝干丝的老茶客，几乎人手一份，既读且谈，其乐无穷。尽管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所在的首都，但地方日报就应该有这种浓郁的地方气息，《南京人报》很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除上述而外，南京还有《扫荡报》、《首都日报》、《中国日报》、《救国报》、《青白报》等，因为不很熟悉，只得从略了。

玄武湖畔忆“中电”

前年本刊载出《南京早期的电影制片厂》一文，叙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辖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初期在南京的建厂经过，已见概略，但也有些细节值得补充，因就拾梦所忆，再录一二。

1934年在江东门外创建的“中电”，其首任厂长黄英，原来是中央宣传部（有一时期称委员会）文艺科摄影组的总干事，后又改电影科。黄英系广东人，与电影企业前辈黎民伟深交，建厂诸事，得到黎的指导。但当时并无摄制故事片的打算，设备简陋，所以只能用手提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摄影机采摄一些新闻、记录片，多半是无声片。可是电影科通过黎民伟的关系，曾搜藏若干珍贵的革命史料影片，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北伐军在广州宣誓仪式等，以及后来自己采摄的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的各项重要活动。抗战中我应邀参加“中电”后，在重庆还见过这些史料。1943年陈鲤庭来“中电”曾逐一放映，分类编卡。后因去江安国立剧校任教，工作中辍。听说解放后，这些影片多半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

玄武湖畔的“中电”，是第二任厂长张冲经手重建的。张是浙江温洲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不知为何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了。新建的厂房，设备比较完善，特别是那架Mitcheu有声摄影机，是当时国内电影界仅有的一部，因此，原在联华公司的著名摄影师周克，也被此机吸引到“中电”来了。两座中型摄影棚联接在一起，隔音较差，不能理想地同时在两棚摄片。也许由于经济关系，“中电”并未同时进口与摄影机可以配套的录音机器，却采用了颜鹤鸣创制的国产设备，效果尚可，终难与舶来的相比。

为了培养演员人材，“中电”确曾从各地招考学员，成立演员训练班，但因缺乏经验丰富的正规师资，不仅演技未得严格训练，生活管理亦极散漫。不少女学员常被邀请去参加达官贵人们的舞会，男学员的思想情况相当复杂，管理人员戴着有色眼镜，疑神疑鬼，有意制造矛盾。所谓洪深、孙瑜、熊佛西等的讲课，只是临时请去演讲，并非经常授课。再加没有实习锻炼的拍片机会，徒然浪费一批年青人的青春。因此到抗战爆发时，学员星散，继续留在场内的女学员，只剩林静、威莉、蓝樱等三、四人。男学员全都放弃演员岗位，分别参加行政事务和技术工作，其中有赵沨（晓痕）钻研音乐，自学成材，解放后担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程宏济刻苦努力，奔赴延安，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笔名“王钢”的作家，足证十步之内，亦有芳草！

玄武湖畔的南京“中电”，除《农人之春》外，实际上只摄制过一部故事片，即张道藩编剧的《密电码》，内容渲染自己在贵州与军阀斗争的“事迹”，有“树碑立传”之意。“中电”原乏导演人才，但逐鹿此片导演的少数人，又明争暗斗不休。偏偏张道藩一个也看不上，特意去上海邀请“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担任导演（此人在沦陷后的上海叛国投敌，被枪杀于聚丰园菜馆）。演员选用了训练班的许彦贤、林静等数人，主角却由原在中国旅行剧团的戴涯担任。片成后，借用政治压力，强迫上海大光明影院首映，售座欠佳。

《密电码》摄制过程中，张冲奉命调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处。继任的是张北海，亦无所建树。“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来上海邀请编导人员的，已是第三任厂长罗学濂了。我和程步高于十月间应聘到南京时，只见场内重要机件设备，均已拆迁芜湖，但办公室和摄影棚的许多工作和生活用具，仍纹丝未动我们赶到芜湖后，战事逼近南京，听说有一位姓赵的事务人员，自告奋勇，愿留守场址。直到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年，赵某只身来到重庆，据说日寇入城后，发见“中电”原址的旁侧有“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加予捣毁后即连带焚毁了“中电”全部建筑。但胜利后，也有人传说，日寇尚未到达时，赵某“监守自盗”，变卖留存公物并以所存汽油纵火灭迹，暗自潜逃，然后再到重庆邀功请赏。真相如何？恐怕死无对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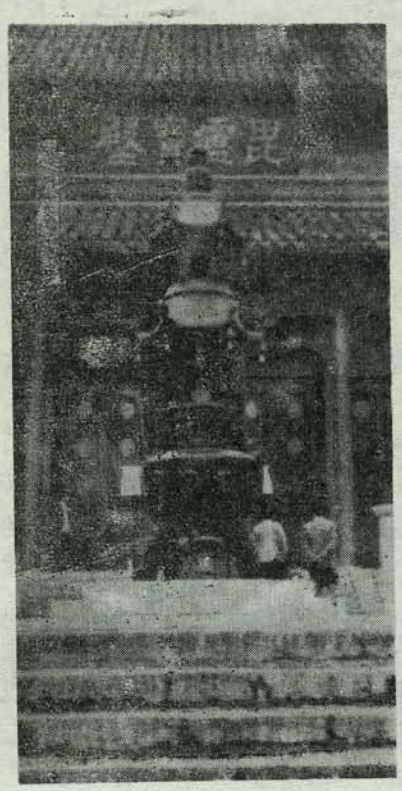
应该附带注明：中央电影摄影这个名称，有点像绕口令，文义也有重叠之弊，在南京的通称是“电影场”。“中电”这一简称，是西迁重庆后开始的；名称虽简了，拍摄的故事片和纪录、新闻片，着实要比以前多了。

寒山栖霞添钟鼎

枫叶红时访铸家

——访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

王引孙逊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的寒山寺随着唐人张继这脍炙人口的诗篇的流传而名声远播。人们在咏诵这首诗篇时自然由钟声而问及钟。寒山寺本有一口唐代铜钟，可惜早已下落不明，后来虽于清朝光绪年间铸了一口，但只有2吨重，且是铁钟，声音不甚宏亮，显不出原有古钟的“夜半钟声”的宏亮和韵味。

幸喜的是，在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的时候，寒山寺有了一口新铸大铜钟。这口仿唐古钟，外形融唐钟、明钟之特色，重50吨，高2.5米，直径荷叶边口1.56米，钟体凸字铭纹有280余字，均为端庄楷书，笔锋清晰，图案线条细腻精致。上镌“寒山寺”三字，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题写。钟悬寺后，撞击一次，余音缭绕长达120秒之久，形、声、色俱佳，国内外游人至此莫不赞美：新钟为古寺增添了新的诗境。人们纷纷询问此钟为谁家所研制？

在深秋时节，枫叶正红的时候，笔者寻踪来到了南京金陵古艺术青研铜究所。王钟泉所长和几位副所长热情接待了我们。王所长说寒山寺的铜钟和南京栖霞寺的宝鼎，均为我所研制，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已为海内外人士所注目。继寒山铜钟和栖霞宝鼎铸成之后，已为各地寺庙铸造了8口大小不一的铜钟、4只鼎、19只磬，还有作为寺庙聚众的火典等。南京鸡鸣寺、浙江普陀山、芜湖赭山广济寺等名山古刹，都有该所的作品，同时还为南京博物院复制了战国时期的圭表和药钵。而这种铸造需要溶合宗教、文物艺术造型、金属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最近，山西五台山、济南宗教处、扬州高旻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高邮佛协、镇江焦山、南京泰山寺、石观音寺、安徽九华寺、江西彭泽、祁门佛协等，先后来电、来人洽谈订货。远在美国有个万佛城，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僧人在那里建立的佛寺，那里原有一座铜钟，是美国铸造，但没有敲几年就坏了，寺僧们一直想铸造一口新钟，由于找不到厂家，一直搁浅。“寒山寺添新钟”（《世界日报》）的消息传出之后，研究所声名远扬海内外，最近万佛城的方丈写信给中国智参老居士，转达要求该所为他们铸造一只6吨重的铜钟，将中国铸造技术弘扬海外，希望园满完成此笔交易。日本姬路市日中文化协会福田一郎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栖霞飞宝鼎，寒山鸣晚钟”的报导后，也写信要求建立这方面的文化交流。新加坡中华佛教协会会长、光明寺主持宏船法师到北京时，也表示要从中国引进佛寺的法器，泰国佛教界也准备来华洽谈建立业务联系。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世界七大奇观”是哪些

白 丁

编者按：本刊去年第五期刊载《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后，关心此事的读者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市政府张耀华市长等负责同志随即批示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研究。此事尚在探讨之中。还有栗文彬、刘志远、黄强等同志询问文中提到的“世界七大奇观”是指哪些，为此我们请白丁同志作一解答。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曾被后世公认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在《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海宁张惠衣著，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商务印书馆发行）一书中的“江南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说明”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额曰第一塔，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与罗马大剧场（即罗马古斗技场——笔者注，下同。）、亚历山大茔窟（即埃及亚历山大古墓）、批莎斜塔（即意大利比萨斜塔）等并称于世。”此外还有中国长城、英国斯毅海奇环形石建筑、土耳其圣索非亚清真寺与上述四个古建筑并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这在1969《科学杂志》上亦有同样记述。这里顺便说一下，还有上古时期的世界七大奇观：即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今属土耳其）的阿苔密斯月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小亚细亚）的摩索拉斯陵墓、地中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亚历山大城的法洛斯灯塔，为“上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此说1980年《文化与生活》上亦有刊介）。

我们随即直率地向王钟泉所长问道：“你们怎么想起来研制古铜钟鼎的呢？”他说，古青铜的铸造，在我国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大约早在夏代就已经发明了铜器，及至商、周更趋成熟，古老灿烂的青铜器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祖国的珍贵遗产，为世界艺术史上所罕见。但在十年动乱中不少文物古迹和寺庙的铜铸法器亦被毁坏、遗失，民间技艺失传，一些专制法器的师傅，纷纷改行，仅有的也已年逾古稀。前几年几乎找不到一家能制古钟的工厂，眼看这一“冷门”行业后继无人，制钟技术将有失传的危险。我想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一濒于失传的古老艺术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当他看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各项事业都在复兴，文物古迹也在修复，一些名寺古刹修复了，没有钟磬怎么行。为了把这份宝贵的古老艺术继承下来传下去，他与几名志同道合者一起，经过多方奔走广泛联系，邀集了雕塑家、书画家、文物考古学家、声学家、力学家、佛学家、民间铸钟老艺人和各路有色金属科技人才等专职、兼职人员五十多人，组成了一支有事业心、技术过硬的专业队伍，创办了这个研究所。专门承接寺院庙堂、文物旅游单位的仿古青铜艺术工艺品，同时对青铜器铸造的造型，合金配制等进行深入的总结研究，从更高层次上提高古艺术青铜制品的质量和音响效果。

自从1985年5月，首次接受了美国通用电脑公司总裁、美籍华人叶晨晖先生(现为该所的名誉理事长)委托，为苏州寒山寺铸钟，这是海外华人集资捐铸的。于1986年10月在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之际，按时交货。从此，苏州城外又能听到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了。

在我们告别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时，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的产品和科研事业，必将欣欣向荣，名扬四海。

李　源



从梁园到湖神庙

梁洲，玄武湖景色最佳处。曾有过旧洲、祖洲、老洲、莲花洲等等名称，而梁洲的名字沿用至今，史家多认为是南朝此处曾建有“梁园”的缘故。

梁园的主人是萧统。这位因编集《文选》十三卷而享誉中国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在这里立亭建馆，广聚文士，使梁园成为他进行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清代编纂的《后湖志》上说：“其时梁园宾客觞咏流连，颇极一时之盛。”《梁书》上也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有关的记载甚至还说，这位太子还曾广植莲花于湖中，以使梁洲有了“莲花洲”的美名。

荷叶田田，修竹箫箫，莲花飘香，湖水荡漾。文人雅士咸集于此，确实会流连忘返的！

可惜，梁园的遗迹，我们今天基本看不到了。唯一可以作为南朝遗物的，是光绪丁丑年间，当时的地方长官廖纶在梁园旧址掘得的一口井。据清代《后湖志》载，“此井自古有之。井内近底处有铜管由井穿湖而南过太平门，迤西通台城内武庙后，于灵福洞出焉。”还说：“其水清洁晶莹，沁心适口。”在发掘中，于井中获得铜钩一具，此井因而称之为“铜钩井”。时至今日，铜钩井的石栏上还刻有廖纶记叙此事始末的一段文字。只是开头“大明”二字，已属好事者篡改。

值得指出的是，在梁园旧址，明初还产生过毛老人庙的传说。据《玄武湖志》记载：“相传造册库时，一老人虑鼠损册。明祖问其姓，对曰：‘毛。’明祖曰：‘猫能伏鼠。’遂活埋之，立毛老人庙春秋祀之。”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毛老人的善良、无辜，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愚昧与残忍。这在明代的诗人纪伯紫、官方修撰的府志也都记载了这件事，看来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后来毛老人庙就成了人们纪念这位善良老人的场所。“后湖洲上人又谓本湖以鱼为大宗出产，今立毛老人庙于湖上，则鱼皆被猫食矣。于是五洲人民公议，遂改为湖神庙。”（见《金陵后湖志·后湖事迹汇录》）

明代的湖神庙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清兵攻入南京，才毁于战火。

现在的玄武湖湖神庙，是清同治十一年重建，光绪四年再修的。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规复旧制，重修湖神庙一座，内有湖神殿、观音阁、大仙楼等所，并建赏荷厅、湖心亭两处”。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显示他的“政绩”，粉饰太平（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重建后的湖神庙内，也曾挂有他的图像。但重建的湖神庙“地势壮丽，形胜天然，屋宇宽宏，亭台轩敞”，确实为玄武湖增色不少。

近代方志学家陈作霖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后湖秋泛记》。文中对当时的湖神庙也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至莲花洲，烟树苍茫，数家临水，朱栏曲榭，若隐若见，则湖神庙在焉。庙居湖心，四周皆水，以棘为墙，不施砖壁。殿南向院中雁来红数十株，鲜艳欲滴，有虫飞集其上，文采烂然。步廊而东亭出，屋际如卓锥。又东为飞楼，楼之北为舫斋，俯临湖渚，凭窗而眺，山色青苍，或远或近，皆献

双牌石

刘德尚　梅小强

双牌石位于溧水、高淳两县交界，距溧水县城33公里，离高淳城镇15公里，至今已有495年的历史。

秦统一天下后，分设郡县。高淳属溧阳县。隋开皇十一年划归溧水县。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应天府丞龚绮以"地矿难制"奏割溧水西南七乡置县，县名"初拟淳化，钦定高淳"。两县埋石为界，"双牌石"由此而得名，至今"碑石"尚存。

清至民国以来，双牌石一片荒芜，乃一"玉冢山"（抛小儿尸）。地势高阜，面怀游山，历史上曾一军事要冲。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战争，双牌石一带成为北伐军攻克南京的第二防线；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保三团"曾在此与日军激战过；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东坝战役，攻克漆桥、游山等伪据点，双牌石又是我军的重要警戒之地。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京建路修复通车后，溧水船桥村有14户贫民迁居谋生。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入侵、溧、高两县沦陷，双牌石民房被焚。翌年，郎（溪）、广（德）失守，双牌石即成日军兵行马踏之要道。行人如惊弓之鸟，随时有遭日军刀枪之祸，卧尸屡见，双牌石成了"鬼门关"。

抗战胜利后，双牌石重还旧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船桥有关人士筹股集资在双牌石开设"达丰"汽车客运公司；高淳"泰康"汽车公司也相继恢复交通营业，从而，沟通了南京等地的生意往来。双牌石一度商旅云集，成了货物堆栈的集散地。

解放后，随着国家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于1956年动工修复公路、桥梁，57年建成通车。从此，双牌石成为南北贯通和商旅通行的要道。1979年途经双牌石日行客运班车达到21对；八十年代客运车日达100多班次。农民自购的手扶拖拉机和个体运输户的"三轮卡"成群结队，运输频繁。从而，沟通了城乡物资的交流。现在，双牌石公路拓宽，集镇成型，市场繁荣，社队商业振兴，一年一度的"国庆"交流会盛况空前。解放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荒山成宝地，黄土变为金"。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共同琢磨 拟好蓝图

——城市志篇目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本刊昆明航讯**〕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城市志指导组主持的城市志篇目研讨会，1987年11月17日至21日在昆明市举行。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和经济计划单列市共32个城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代表参加，部分省和其他城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城市志指导组正、副组长陆天虹、梅关桦，复旦大学教授黄苇，南京市志办主任杨之水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会议围绕城市志总体设计和篇目问题，研讨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地方志工作者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我国社会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为编修新方志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深入认识编修城市志的指导思想、目的、功用、总体设计和篇目体例、保证质量等问题，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城市志工作者要以这个精神来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排除“左”的、右的干扰，准确地认识城市，进而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城市的基本面貌，提高城市志的科学水平。

二、掌握了拟订城市志篇目设置和总体结构的基本要求。篇目，也称纲目或大纲，正如一项工程的框架和蓝图一样重要。在地方志中，是将一地（省、市、县）古今的人、事、物的主要方面，按详今略古原则，分清主次，合理地科学地加以排列，成为全志的基本结构和框架。篇目的产生和定型，有一个由粗到细，不断修改到定型的完善过程，即随着修志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备、成熟、精确、定型，最后才成型。所以篇目的拟订和定型是贯串修志始终的，既要十分重视，抓紧拟订，又不能旷日持久地待篇目搞得万无一失才动手编写，以免耽误修志的进程。

对于总体结构，不论是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类先设少数几个大编后设几十个分志，或减掉“大编”的层次，直接平列设几十个分志，或介乎两者之间，或在编一部高度概括的“总志”的同时，又平行地编写若干较详备的“分志”，都必须根据各城市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以及组织领导和编写、出版的具体条件而定，不必强求一致。

三、认识了设置门类及其以下层次的一些基本原则。门类设置，应从现代城市的社会分工的实际出发，参考一般学科分类和志书的门类设置传统，以能达到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城市基本面貌的目的为标准。这些门类，既不是纯粹按部门或事业设置，也不是对城市各方面作所谓纯科学的划分，而是为了反映城市基本面貌而列出的要素。门类的设置还应体现城市志异于其它志书的特点，比如应将“城市建设”作为独立的重要

全国省志篇目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本刊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1月9日至13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省志篇目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辽宁、江西、黑龙江、福建、云南、湖南、陕西、湖北、吉林、河南、四川、山东、甘肃、江苏、河北、山西、安徽、青海、广东、贵州、浙江、广西、内蒙、新疆、宁夏等省（区）和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地方志编委会及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同志，共43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孔令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曹贵林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江苏省各市地方志办公室派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主题是讨论省志篇目如何体现整体性问题。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梁寒冰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什么叫整体性？地方志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孤立的。除图表的配合外，各种组成部分不但要有横的联系，还要注意纵的联系。资料排列，要体现因果。从多样性出发，资料要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分门别类，抓住本质，概括事物。怎样体现整体性？志书的各个部分要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使之浑然一体，成为一部有机联系的科学资料书。各专志要科学分类，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要逐步形成地方志的科学体系。现在分类主要从门类，“经济管理”的内容应多加记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中心的地位应突出等。一是层次尽量精减，二是不宜强调“横分到底”。在哪个层次上横排或纵列标题，甚至在编写的基本单元中，是依时纵写还是按几个方面横写，也须视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灵活安排。很多市志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设置“综述”、“概述”等题目，是注意了事物的整体性，加强客观叙述和力求体现多门类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较好办法。同时也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从叙述结构上找出路，而应深入到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及跟其它事物的联系、制约、影响上，更多地从提供有系统的资料的要求上下功夫。

四、探讨了市志中如何记载属县情况的问题。各市已有初步探讨，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形式，都是有意义的尝试。但尚需进一步从市志的特征、功用等方面深入思考，市管县到底有哪些实际内容，应该设置或结合于哪些门类较为适当。多数同志认为，市志应适当记述属县情况，为避免与县志重复交叉，应有选择地，从客观上进行高角度的记述。

五、进一步强调确保志书的质量。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后，这个问题已引起各市的普遍重视，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充实机构，积极开展评定技术职务的工作，改善方志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提高主笔的业务素质，吸收专家、学者参与并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对保证志书质量都是有效的。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并要求各市重视这个问题，以党的十三大理论为指导，编纂出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是方志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提高城市志质量的根本保证。大会还要求大家加强城市志理论研究，写出论文，下一次研讨会专门探讨这个专题。

（本刊特派记者　王能伟）

金陵十八坊

方诚修



在古代，“坊”是一种闾里制度。《说文》坊：“邑里之名，从土。方声，通用埅。”古坊里制度，设高墙，保护庄院，多半是贵族的财坊。以后坊的形式逐渐改变。

对坊名的由来，具有以下的几种形式：

一是用官衔列为地名的，如：武陵坊、库司坊、进士坊、状元坊。

一是以褒扬纪念而列为地名的，如：忠义坊、节孝坊、孝子坊、旌德坊。

一是以地名或建筑名称列为地名的，如：建邺坊、石城坊、金陵坊、翔鸾坊（庙名）。

一是表示吉庆之意列为地名的，如：庆云坊、万岁坊、紫金坊、永安坊。

一是以姓氏为坊名的，如：王坊、倪坊、东杨坊、西杨坊。

还有的是用以标志行止，建立牌坊以后，列为地名的，如：下马坊。

更有一种是具有一定的含义，而竖以彩绘牌坊后列为地名的如百猫坊。

以下所述，主要是从原来是作坊，而后演变为地名的方面来谈的。

明洪武二十四年，曾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四万五千手工业匠户，约二十万人。集中在城南的十八个作坊。这十八个作坊，叫：颜料坊、踹布坊、豆腐坊、弓匠坊、箭匠坊、白酒坊、织锦坊、细柳坊、锦绣坊、木匠坊、铜作坊、铁作坊、银作坊、鞍辔坊、皮作坊、毡匠坊、机匠坊、钦化坊。而这些坊名，有的沿用而后列为地名；有的只是当年称为作坊，后来并未列为街巷名称；也有的以其它街巷之名取而代之了。

今将当年有名的十八坊坊名的由来及遗址所在，分列如下：

一、颜料坊 《袁志》：“颜料坊在彩霞街东，即古西市。”这里是制作染料的作

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能、不必要形成一个统一模式。各专志内部要注意纵的联系，专志间要注意横的联系。这两种联系形成地方志的整体性。在会上，孔令士同志传达了9月28日至29日在京召开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扩大会议的精神，布置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认真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同时继续学习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文件，特别是胡乔木同志讲话。

会议讨论十分热烈，有27位同志发言。围绕篇目的整体性，集中的议题是：从志书的整体和更高层次，来考虑总体设计、篇章结构的设计；从志书的指导思想、内容、篇章结构、文风、体例和资料筛选诸方面，理解志书的整体性；志书的整体性与科学性，与体现地方特点，与其它学科体系等的关系；志书组织门类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平列式和分门归类式两种，各有长短，互有补充；志书几种体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配合……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篇目讨论会是广西南宁省志体例篇目座谈会的继续、提高和发展。

（本刊特约记者 **吴福林**）

广西地方志 dfzgxjing.gxsy.cn

坊所在，当年这里不仅是生产颜料的作坊，也是销售颜料的市场。直至清末民初这里仍有不少染坊和颜料店，现仍为街道的名称。

二、踹布坊 位于建邺路中段南侧、评事街中段东侧，一条S形的小巷，明朝从这里一直到内桥湾，均是踹布的作坊。本世纪三十年代，尚见此处有很多人家仍在晾晒着一匹匹的染色土布。

三、豆腐坊 现在南京有豆腐巷和豆腐坊两地名。位于今城南门东豆腐巷，东接大、小荷花巷，西南至新民坊，明朝这里就是豆腐作坊，清朝更进一步扩大，由于这作坊的所在，该地就称作豆腐巷了。《首都志》："豆腐巷原名豆腐坊"。即指此处。而今凤游寺的豆腐坊，出现较晚，也曾名豆腐巷，为避免同名，1950年并入慈悲阁始改称豆腐坊。《街巷名册》列的并非明朝的豆腐作坊。

四、弓匠坊 即今弓箭坊北段，南自洋珠巷口，北至昇州路一段旧称。这里是明朝制作弓的作坊，与南段的箭匠坊，同为当年制作弓箭的分项专业作坊。《首都志》"此巷旧有半边塔，砖砌七级，高一丈有奇，倚墙而立，仅露其半，全身佛像，一一俱全，毁于咸丰战火。"

五、箭匠坊 即今弓箭坊南段，北自洋珠巷，南至颜料坊。这里是明朝制作箭的作坊所在。"又据说东吴时，这里已是制作弓箭的作坊了"。《地名录》明代以下即将两个作坊名称并称弓箭坊的地名，至今沿用未变。这段地名又曾名凤凰井据传在今弓箭坊南段街旁，尚有古凤凰井遗迹，水深清澈可饮。又以曾有皇妃居此井侧，故名凤凰井。

六、白酒坊 遗址在今中华路南段东侧，厨子营以东。当年这里制酒的作坊，传说是由沈万三负责经营的，只是米酒，故称白酒。至今仍遗为街巷名称。但早已没有酒坊的遗迹了。

七、织锦坊 即今剪子巷东端北侧，是明朝织锦的作坊所在。据说八间房即当年织锦的机坊，虽曾为地名，但早已并为双塘园了。

八、细柳坊 《肇域志》引《南畿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地点在今白下路内桥北侧，是明朝柳条编织工匠聚集的作坊，故当时又称细柳坊。《万历上元县志》记述细柳坊与武胜坊合并，改称广艺街。

九、锦绣坊 《白下琐言》"西锦绣坊在县治西，其东有街，即东锦绣坊。"位于中华路中段东侧，东至旧王府，今天仍名锦绣坊，早在南唐即在此树立门阙，两侧分别称东、西锦绣坊。宋高宗迁江宁府于西锦绣坊，称府西街；东锦绣坊则仅称锦绣坊了。明朝更在此发展了锦绣的作坊，直至清末明初，在锦绣坊的居民仍多以锦绣为业，有名的张象发锦绣店，曾闻名全国。1932年开辟中华路，居民虽多改业，锦绣坊地名犹在。

十、木匠坊 这是明朝制作家俱的木器作坊，地点原在建康路东段南侧的钓鱼巷内，清朝尚与饮酒亭并连，早已并为钓鱼巷，今已无迹可寻了。

十一、铜作坊 即今铜作坊北段，南自金沙井，北至昇州路，为明代制作铜器工人集中的作坊所在。三十年代的"坊口"，尚多铜器店，有名的桐茂铜锡店就在此处，至今仍遗为街巷名称。"文革"时曾与南段铁作坊并为中山南路。1982年包括铁作坊在内恢复铜作坊原名。旧有土地坊，是纪念田得满的。

十二、铁作坊 即今铜作坊南段，南自长乐路，北至金沙井，是明朝制作铁器的作坊，至今仍遗为街巷名称。"文革"时曾与北段铜作坊并为中山南路，1982年又并称为铜作坊。

十三、银作坊 即今秦状元巷南段，南自长乐路，北至许家巷一段旧称。《洪武京城图志》"著录坊名二十三个，将金陵坊改

南京市地方志 nanjing.gov.cn

作银作坊。”《袁志》“银作坊在县治东，即古建邺坊，东通古御道。”这里是明朝制作银器工人集中的作坊所在。清朝由于县衙在东侧，即今邮电学校内，县衙牢房有洞在此，故称牢洞巷，民初又恢复明代银作坊原名。解放前邻近中华路，仍有很多银楼，就近仍有制作银器的作坊。“文革”时曾与南段的秦状元巷，并称秦银巷。1982年南段并入邮电学校内，北段改并为秦状元巷。银作坊街巷之名称，也就从此无闻了。

十四、鞍辔坊 《佟志》：“在县治南，北通层楼巷。”按扁担廊是古层楼巷。位于中华路南段西侧，东北至实辉巷，西南至璇子巷，北通扁担廊。这一地段，是明朝集中制作鞍辔的作坊所在，至今仍遗为街巷名称。

十五、皮作坊 明朝从七家湾宰牛场，经牛皮街（今甘雨巷北段），到评事街，均是制作皮革的作坊。直至三十年代，这里居民，尚多以制皮为业，沿红土桥河畔，撑晒牛皮。评事街更为皮货市场，亦曾称皮作坊和皮市街，当年摊贩云集，十分热闹。今已无迹可寻了。

十六、毡匠坊 是制作毡绒及绫子的集中作坊，遗址在今绫庄巷和绒庄巷一带。据早年居白衣庵10号庵中的妙空和尚谈：“此处即为明朝制作毡绒和绫子的作坊，当时较大的作坊叫刘万丰，占有大半条街道。”至今仍遗为一条很长的绒庄街，南接大板巷，北至鸽子桥，长达357米，但今毡绒作坊的迹象，已毫无可寻了。

十七、机匠坊 遗址在今胭脂巷至大、小仙鹤街一带，自明至清，居民均以纺织丝绸为业，俗称机坊。今集庆路新桥口端，亦即明丝市口所在。民间传说：“仙鹤街一户母子二人，得七仙女相助，所织云锦上面仙鹤逼真。”这里直到解放初明，居民仍多以机织为业，但并未列为街巷名称。

十八、钦化坊 即今笪桥市所在，连接木料市一带，完全是纸扎作坊。《白下琐言》“笪桥市为金陵一胜，中元节鱼龙纷遝，有银花火树之观，其中彩灯五光十色，尤为佳妙。”这里明代是扎灯结彩的手工业作坊。直至三十年代，仍多亭台纸扎店，比户而居，但并未以作坊列为地名。毡匠坊、机匠坊、钦化坊虽未演变为地名，但长期以来，民间都以坊名俗称其地，故列入金陵古地名。



《广西地方志》公开发行

南京市地方志 dfzh.nanjing.gov.cn

广西通志馆主办的《广西地方志》双月刊，经申报批准1988年起公开发行。全国统一刊号CN45—1034。

本刊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双百”方针，立足广西，精选全国来稿，以繁荣方志学术，指导新志编写为己任。栏目有方志论坛、志书编写、志稿选评、争鸣园地、各地文摘、理论信息等读者和作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本刊欢迎来稿，但反对一稿多投。稿件一经刊用即奉稿酬。新人新作和新深度的来稿，优先发表。

本刊全年一套（6本）5.10元（含邮资）汇广西通志馆发行组。开户银行南宁市中山办，帐号：1089165。

地名探源

岔路口与仙鹤门

胡汉林

岔路口，位于南京太平门外，紫金山的北麓；因此地有多股道路相交，故名。如今，南京栖霞区尧化镇，所属的岔路口居委会，就设在此地。

岔路口，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清朝同治《上江两县志》的山势图上，曾记名为：车路口；解放后，曾改名叫：双喜门。

岔路口，地理位置重要，是南京太平门外通道的咽喉；它东有聚宝山、杨坊山，北有朝阳山，银凸山，西南面有紫金山，三处峰岭鼎立，形势险峻，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清朝时期，此处有重兵驻扎，扼守咽喉；至今仍有三个村叫：上五旗、下五旗、上三旗，就是当年驻军的营地。太平军攻打南京时，有一支部队在杨坊山，和清军争战，太平军牺牲近百名，均葬在杨坊山东的乌龟盘山陵上。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时，也在杨坊山、银凸山，展开了一场恶战。蒋介石统治南京时，也在此地的各山头，修造了许多碉堡，作为一道重要防线。

今日的岔路口，沪宁铁路、宁镇公路、仙岔公路、紫金山环山路，均在此相交，新修的沪宁高速公路，也穿越此地，已成为南京东北方向公路枢纽。

仙鹤门，是南京明代城廓的十六门之一（后演为十八门）。其名称的由来，传说有二：一说是，昔日，仙鹤门一带，低洼多水，芦苇丛生，吸引很多仙鹤到此栖居。仙鹤门之名，由此而来。至今，此地邻近尚有海口子、东码头、西码头旧址多处。

另一说是，借用邻近山形命名的。在仙鹤门北边，约二里许，有座山岭，现在的名称叫杨梅山，当地乡民习惯地称为“仙鹤观”。这座山的西半段，其形状就象一只大仙鹤。人们从南边的远处遥望，如同一只仙鹤在水中游戈；如果登上山顶俯视，它又象一只仙鹤在空中飞翔。鹤头朝东，鹤尾指西，山的主体两侧，各有一道小山岭，恰似伸展开的两翼。据地方志记载，汉朝，在山顶上建起的一座古庙，借山形取名“仙鹤观”。这座道观，是南京地区最早的道观，也是历代道教活动的重要聚集处。

历史上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庙中作道场一天；后定于三月十六日为庙会，现仙鹤观已毁，但庙会的习俗仍在沿传。现在的仙鹤门，是南京市东面的一条重要通道。明朝建的外城廓，已改成外环城公路，东南连宁杭公路，北至长江大桥；向西两条公路，一条经太平门到孝陵卫；一条经龙潭到镇江，交通便利。

启事

1.本刊1987年第6期已售完，许多读者来信来电希望加印，但字版已拆，无法再印，特此说明，请谅解。

2.1984年第1期、1986年第1期因读者需要，如肯转让者按原价回收。

3.1987年合订本只装订300套，已预订出205套，现仅有95套，如需要者按汇钱先后寄出，售完为止。平装每套4元、精装5.5元。

《南京史志》读者服务部

南京市地方志 cz.nanjing.gov.cn

郑　隐

江左大才子

袁枚轶事



袁枚，少负才名，称誉一时。挂冠归山之后，勤于治学，致力著述，以“一代骚坛主”，总领文苑近五十年。他穷毕生之力，冲决“格调派”、“肌理派”的藩篱，倡导“性灵说”，独树一帜，风糜乾嘉，使清代诗坛耳目一新，生面别开，为推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袁枚亦有吏才，自诩：“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做诗人。”他历任溧水、江浦、沭阳和江宁知县。虽仅六载，但多所建树，蜚声遐迩，可称一代循吏。

袁枚终其一生，虽然不失瑕疵之处，但他的思想表现出反道统、反礼教，要求个性自由的倾向，是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的。封建卫道者仍斥责其“乃名教罪人”，显然不足为训。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汲取了叛逆精神的著名诗人，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自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辞官卜居江宁（今南京）小仓山，息影随园，至嘉庆二年（1797）卒，在南京生活了五十个春秋。他在南京历史上人文荟萃的星河中，始终是一颗璀璨的星辰。

垂髫入泮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袁枚诞生在浙江钱塘（今杭州）艮山门内的大树巷。

“袁家生了一个男孩！”

路边宅旁那株高槐的枝头，也像是增添几许生意，洒落一片春色。平日僻静、幽冷的小巷，一下子热闹起来。

邻里庆贺盈门，络绎不绝，陈设简陋的屋里挤得简直转不过身来。袁家自旦釜公故世，已经多年难有这种欢声暄语的气氛了。

袁枚的祖父名锜，字旦釜，中过秀才，乡试却连年落第。仕途无望，转而为吏，碌碌无为，潦倒一生。五十岁时，他在巩县幕中，自感身世飘零，意气消磨，提笔吟咏《沁园春》二阙，云：“叹一经糟粕，挂名入泮；八场傀儡，逐队登台。渐渐消磨，人生老矣，富贵功名安在哉！休伤感，且搜寻秃管，别作生涯。”又云：“几年浪迹天涯，若个是狂夫不忆家。看零丁弟妹，睁睁望我；矫柔儿女，悄悄呼爷。恨不乘风，飘然归去，可

奈关河道路赊！黄昏后，问有谁伴我，数点寒鸦。”他迭经人生坎坷，终于期待无望，撒手人寰。遗有诗一册，蝇头草书。袁枚幼时曾经手录，后来也一直带在身边。在辗转迁徙中竟至遗失，他是深引为憾的。

袁枚的祖母柴氏悲不自胜。她强忍住巨创深痛，把满腔希望又寄托在儿子身上。袁枚的父亲袁滨，命运同样窘困，幕游四方，当了一名刑名师爷。渐渐地，门庭依旧，光景却越来越寒伧了。往往依靠袁枚的母亲章氏，替人做女红来贴补家用。祖母心如死灰，又黯然陷入颓丧。袁枚的出世，使她一扫愁苦。冷漠的心境，仿佛被和熙的春风吹开。朦朦胧胧的憧憬，又在眼前浮现。她把一个老年妇人的爱，全部倾注给孙儿。直到袁枚八岁，她每晚都要把袁枚抱在怀中，望着他静静入睡，似乎生怕惊破一场美梦，带来她晚年再也经受不住的破灭。

然而，为培养袁枚耗尽心血的却是姑母。婚配沈氏的姑母，命运多舛。三十一岁时丧夫寡居，归依母家守志。身世孤苦的姑母，默默地为袁枚开拓前途，几乎心力交瘁。袁枚的饮食起居，浣衣盥面，无不受到她精细照拂。她又略通文史，为袁枚启开知识宝藏，真正成为他的第一位启蒙业师。勤于诵读的袁枚，当接触到深奥的《盘庚》、《大浩》这类文章时，苦于佶屈聱牙，往往不能竟读。姑母总是陪伴他齐声同读，直到能够通畅地朗朗背诵。夏天傍晚纳凉，冬天围炉夜话，姑母更是娓娓而谈，泛论古今，臧否人物。有一次，谈论古代孝子，从“戏采娱亲”到“毛义捧檄”、“伯俞泣杖”。及至谈到“郭巨埋儿”，姑母竟沉下脸来，声恶痛绝地作诗斥责：“无端枉杀矫儿命，有食徒伤老母情”。又说：“忍心自古遭严谴，天赐黄金事不平。”不仅否定了郭巨的行为，甚至对天也敢于非议。这件事在袁枚幼小心灵上，镂刻下深深的印记。十四岁那年，他写了一篇《郭巨埋儿论》。阐发姑母的思想。后来，袁枚宣扬“人情”，反对“不近人情”，对传统观念勇于怀疑，不能不说是幼年就打下思想基础的。袁枚出版文集时，把这篇文章也收了进去。表现出他缅怀姑母，铭记训育的深恩。

姑母的训迪，终究代替不了正规的师教。袁枚到了上学的年龄，被送进蒙馆受业。在眼昏花的业师督促下，整天诵读《四书》、《五经》。这位，“诗名压倒九州”人的清代诗坛领袖，当时根本不知道诗是什么，更谈不上吟咏赋诗了。在袁枚面前揭开诗的奥秘，把他引进华生盘桓的这个天地的，是他九岁时偶然碰到的一次机遇。

那年，业师有一天外出。他的友人张自南来访，求售书籍。适逢其会，袁枚的舅舅章升扶也来看望外甥。他见到这位愁容戚面，辞哀语切的贫穷读书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便央得袁枚母亲解囊，告贷给他二星纹银。留下的这册书便到了袁枚的手里。他怀着幼稚的好奇心理，翻开密密圈点的书卷，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仿佛似曾相识，不忍释卷。这是一册四卷的《古诗选》，始于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从此，袁枚每逢业师外出，或是岁终解馆，便把卷玩味，吟咏而摹仿。不久，袁枚偕人游吴山，登高望远，兴之所至，居然吟成五律一首，其中一联云：“眼前两三级，足下万千家。”当他晚年重游吴山时，不觉又回忆起这两句诗，仍“觉童语终是真语”。而对张自南售书段些往事，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乾隆诗坛众口交誉袁枚为“奇才”、“才子”。江左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之一的赵翼，为袁枚诗册题诗云：“八扇天门诀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其实，袁枚达到如此造诣，奠定乾隆诗坛的泰斗地位，固然由于他幼有异禀，聪明颖慧，更在于他自幼嗜书为命，勤读苦记，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底。

他无钱买书。有位姓张的同乡，藏书甚富，却不愿借给他。因此，袁枚对能借到的书，更加珍视，刻苦攻读。他自述道："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至今所摘记，多半儿时为。"赋诗云："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可见"才子"的"奇才"，绝非天外飘来，与生俱至的。

袁枚到底没有辜负祖母的期望。雍正五年，十二岁时考中秀才。垂髫入泮，一时成为钱塘的佳话。六十年后，乾隆五十二年，袁枚旧地重游，作重赴泮宫诗，生动地记述了当年的盛况和他重赴泮宫时怅然于怀的心情。其诗云："记得垂髫泮水游，一时佳话遍杭州。青矜乍著心虽喜，红粉争看脸尚羞。梦里荣华为顷刻，人间花甲已重周。诸公可当同年看，替插芹头插白头。"

但是，袁枚始终看不起八股文，不肯下功夫。他说："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所以，他在成为秀才后，连续四次参加乡试，却累遭落第，没有考上举人。

孤身远行

雍正十三年，时届岁尾，迫近年关。

这年八月间，雍正晏驾，皇四子弘历继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国恤期间，全民居丧，照例彻乐减餐，连头发都不准剃。官绅士民苦熬日久，早就盼着岁首佳节，畅意一欢。钱塘向来是繁华奢糜的地方，更是一派歌舞升平，居生处乐的景象。

袁家却门庭落寞，冷冷清清。袁枚的祖母积病累月，沉疴不起，一家人的心情异常愁苦。而袁枚又要离家远行，生离死别，那里还有心绪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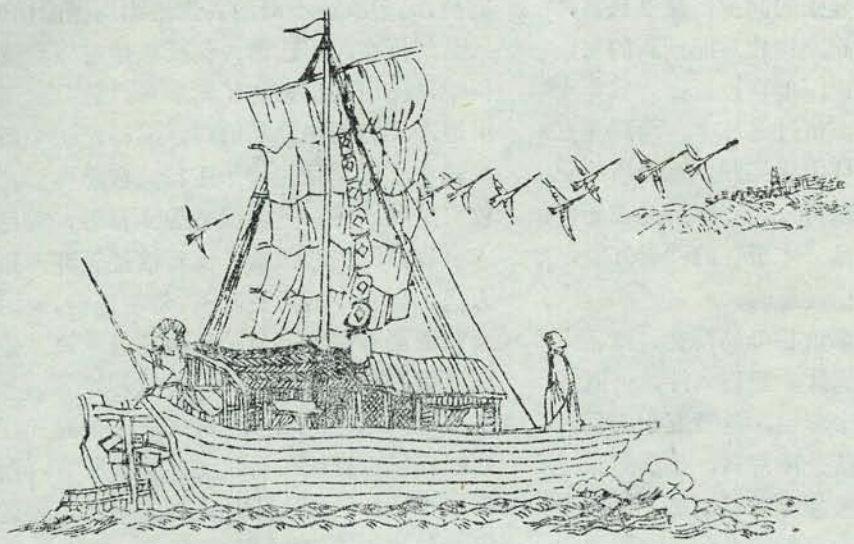
袁枚自经县试入学，转眼已届弱冠之年。终日蛰处一隅，从未离钱塘一步。他深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早有负笈远游的抱负，渴望放荡不羁地去遨游山川探幽访胜。只是父母在，不远游，何况家中难以为继的困境，出门的盘缠也了无着落。好几次话到嘴边，又讷讷地说不出口，只得把这个愿望深藏在心里。现在终于成行，宿愿得偿，袁枚自然欣欣有喜色。但一想到祖母，病已渐入膏肓，又忧心殷殷。此行浪迹天涯，相阻万里，再也不能晨昏定省，侍奉汤药，何时重返钱塘更难逆料，恐怕离别竟成永诀。他想到这里，不禁怆恨伤怀，迟疑却步了。

这次远行，袁枚是奉父命，投靠远在广西的叔父。袁滨东拼西凑，罄其所有，盘缠仍然不足。为难之际，袁枚的挚友柴致远闻讯，匆匆赶来相告，他的兄长柴东升受聘于高安县署，择日赴任，顾挈袁枚同至江西署中，再转道广西。

路资总算有了着落。临到行期，袁枚辞别亲人。当走到巷口时，又忍不住回头凝视。晨光熹微，寒风萧萧，三妹素文正倚着姑母，伫立在门旁，悲悲戚戚地恸哭。袁枚心头一酸，眼眶湿润了。他强忍住凄楚的泪水，转身向大街奔去。

袁枚这次离家，牵萦于心的，除祖母就是素文了。他年长素文四岁。从小同读书，共嬉游游，形影相随，友笃情深。素文是不幸的。她生前就与如皋高家指腹为婚。但是遇人不淑。高家子形容委琐，行为又恶劣无赖。高家的家长，恐连累素文，曾委婉地提出退婚。素文囿于礼教，在那个贞操重于生命的时代，说什么也不敢毁约。但想到婚嫁后的冷落光景，难挨的岁月，往往独自悲伤，暗暗哭泣。她在一首诗中写道："欲卷湘帘问岁华，不知春在几人家？一双燕子殷勤甚，衔到窗前尽落花。"素文婚后果然命薄，高家子万般摧残，以至为偿还赌债，差一点将她卖掉。素文终于不堪其辱，与丈夫离异，归家侍母。由于长期忧郁，疾病缠身，于乾隆二十四年的冬天，死在随园，葬于阳山。袁枚悲痛欲绝。写下"哭三妹五十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韵”。而袁枚在五十二岁时又写下了《祭妹文》，更是凄楚动人，感人至深，予人同哭一声。素文的悲剧，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酿成的。袁枚从少年时期反对郭区埋儿，到老年把矛头指向圣人的诗书，怀疑节义之说，袁枚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了。

袁枚随柴东升西行，在舟中或是泛论兴废，或是赋诗联句，一路上倒并不寂寞。一天，在鄱阳湖边，见到一株可以蔽牛的大树，已经腐朽倒折，委弃在路旁。依傍这株枯树，竟然另生一支干，穿根而出，婷婷盖盖，高达十余丈。柴东升告诉袁枚，传说朱元璋曾在这里与陈友谅相遇激战，幸赖此树蔽遮，代受炮火，才避免遭难。朱元璋感激冥冥中上天保佑，大树庇护，竟特旨封为将军。至今烧灼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袁枚闻毕顿萌诗意，有感联句。柴东升首先吟道：“大树兵火余，枯根尚委地。”袁枚应声续道：“曾抱纪忠信，一死代汉帝。”柴东升又吟：“轮囷根盘存，焦枯枝叶叶。”袁枚吟道：“丛丛莓苔痕，郁郁霜露气。”柴东升吟：“祖干扶桑倾，孙枝小龙继。”袁枚再续：“穿出盘古坟，犹作拿云臂。”柴东升沉吟不语，端详着袁枚，心中暗暗赞许他的志向。但想到宦途险峻，本想有所规劝，又不愿说破，便感叹地说：“这两句险绝，不必续下去了。”彼此心照，一笑作罢。

在高安县，袁枚无心盘桓，仅仅滞留了几天。行前，柴东升赠银十二两。

从鄱阳登舟，经湖口，入长江。这一天薄暮时分，抵达洞庭湖，泊在一处小镇外。袁枚局促船舱，蜷伏多日，真想上岸走走。他立在船头，极目而视，天空阴霾，凄雨绵绵。阵阵冷风吹过迷茫的湖面，漠漠远山影影绰绰。此情此景，兴味已经索然，而刺骨的寒气，穿透他单薄的棉衣，冻得浑身不住颤抖。他又返回舱中，盖上棉被，和衣躺下。偏偏空空的腹中，饥肠辘辘，袭来难忍的饥饿。他取出两个冷馒头，打算讨碗热水，又怕惊动船家，干脆再放进膝箧。这一折腾，哪里还能睡得着？浮想翻联，不禁想到范仲淹，默默地背诵《岳阳楼记》，立时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渐渐地睡去。

出洞庭，入湘江。袁枚历尽饥寒，备尝辛酸，总算挨到了桂林，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他弃舟登岸，沿路询问，找到了巡抚衙门，访到叔父袁鸿，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袁鸿，字健磐，正在广西巡抚金供幕中。他年轻时也不甘心为池中物。但屈指徘徊，岁月空流，添列幕僚而已。他在广西三十余年，最后老死在那里。他的一首诗，是他身世的真实写照：“吾身最飘泊，浪迹满征衣。紫陌春犹在，青年事已非。水宽鱼未活，树密鸟难依。朽骨埋何处，秋原瘴雨飞。”

袁枚到达的这一天，正是袁鸿烦燥不安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的时候。明天就是丙辰端午，照例金铁要奉柬邀约，小酌贺节。今年到此刻尚无音讯，他焉能不急？当听到敲门声时，他兴冲冲地拉开门栓，却是个陌生人，随手就要关门。袁枚赶紧请安，喊声："叔叔。"袁鸿这才依稀辨出侄儿的容貌。一股莫名的怒气，顿时喷泄出来。他恼怒地说："你不该来！不该来！"怫然地迳自转身进屋。

伫立一旁的袁枚，像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感到莫名其妙地惶惑。叔父经济拮据，生计维艰，他在钱塘就听说的。父亲的意思是，易地依傍叔父觅取一个上进的机会。袁枚也绝无吃闲饭、享富贵的念头。可是，叔父不问来由，拒之门外，倒是始料不及的。

待到邀约的人来过以后，袁鸿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还有点懊悔。他很快地想到一个弥补的办法，明天把袁枚引见给金铁。剩下的事，那就看袁枚自己的才具和运气了。

金铁是爱才的。他热心奖掖人才，选拔佳士。平日总喜欢邀约三两个知己的幕友，饮酒赋诗，谈论古今。处理公事则多方商议，详加斟酌务求宽洪。他任藩司时，作了一付对联，贴在官厅上："坐此似同舟，宦情彼此关休戚；须臾参大府，公事何妨多酌商。"他在广西为官九年，"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

果然，金铁第二天就传话召见袁枚。一见之下，袁枚长身鹤立，广颡丰颔，齿为扁贝，声若洪钟的仪表风采，给金铁留下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宴席上，举杯交错之际，金便询问袁枚旅途见闻，似乎是不经意地从江西联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他旁证博引，认为王勃时年十四的说法不确。文章中，"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一句，明白无疑地表明，王勃当时是二十岁，和袁枚的年龄相仿佛。话中有音，一听便知金铁想要面试袁枚。

袁鸿即刻领悟，心里却是且喜且忧。喜的是千金易得，机遇难求；忧的是摸不到侄儿的深浅，腹中究竟是几斗墨水？他在旁边蹙着眉，暗暗地捏着一把汗。袁枚当然也心领神会，但他自负才思敏捷，反倒成竹在胸，隐隐地流露出跃跃欲试的样子。金铁察言观色，兴致大增。沉吟一下，他告诉袁枚，前不久得到铜鼓两面，相传是诸葛武侯征蛮时铸造的。接着，话锋一转，笑吟吟地说，既有《滕王阁序》的佳话在前，何不继以《铜鼓赋》的美事于后呢？同席的人自然同声附和，一片赞许。

袁枚揣度金铁此举大有深意，断不能掉以轻心，殆笑大方。他便拱着手一再谦让，其实已经在打腹稿。等到通篇构思了一遍，方慨然允诺，起身说一声告罪。随即，俯身书案，奋笔疾书，片刻立就。

金铁接过文稿，仔细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洋洋洒洒千言，行文瑰丽奔放，满纸才气。金铁抬头端量着袁枚，萌生出爱怜之意。他想到前不久朝廷发出的谕令，心里有了打算。待到酒阑席终，他留下袁鸿，示意邀约袁枚住进抚衙读书。袁鸿听到这个意外的厚爱，心里着实为袁枚庆幸，一再向金铁告谢。

这样，袁枚到达桂林的第二天，便搬进巡抚衙门的外书房。那篇《铜鼓赋》，金铁传命刻入省志艺文类。乾隆四十九年，袁枚重游桂林索取省志一阅，重睹此赋，且惊且感，题一绝云："五十年前《铜鼓赋》，自家披阅自家怜。不图漓水崇文目，竟冠熙朝第一篇。"



（连载之一）

广西地方志 dfzjs.gxzf.gov.cn

·秦淮杂忆·

赛珍珠其人其事

江苏镇江　宋志成

在镇江市第二中学（原镇江市私立崇实女子中学）校史上，有一位名流人物，她叫赛珍珠，是位美国女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赛珍珠基金会”的美国友人，曾多次来镇江二中，访问赛珍珠的故居。对赛珍珠的评价，颇有争议，现据有关材料，向大家介绍一二。

赛珍珠本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pearl Buck）。赛珍珠这个名字，则是她因崇拜清末名妓赛金花而专门取的中国名字。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洲西部，父母是传教士，她出生未几月即随父母来中国镇江，少年时曾在崇实女中（今市二中前身）读过中国经书，受教于满族国文教员柏秉节，十五岁去上海读完两年高中。十七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1914年，大学毕业后来镇江，在其母校崇实女校授英文，同时照料病中母亲计三年。1917年，她离开镇江，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并从事传教工作，先后任教于安徽宿县教会学校，中央大学，金陵女大。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1934年她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从事写作。

赛珍珠于1922年开始写作，一生写了85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她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文艺评论。她的成名作《大地》于1931年发表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于1932年获普利策奖金。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这些就是她的代表作《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这些书，使她名噪一时，她被称为“中国通”。1938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予了这样的评语，“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多采而真挚坦率的史诗般的描绘”，她的作品被誉为“传记文学的杰作”。

事实上，赛珍珠并不是什么“中国通”，她所描写的“不过是一点浮面的情形”（鲁迅语）。至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则更是大谬不然。赛珍珠作品里的情节，不过是凭借一些极个别事件杜撰出来的，根本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她自称热爱中国，但她热爱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而对中国的革命一直是持敌视态度的。早在1928年，她就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到她晚年，在她的《北京来信》(1957年)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1969年)中她更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敌对情绪。

赛珍珠虽自小在中国长大，由于受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使她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形，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一方面由于她没有与广大民众的接触与联系，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她的出身、经历等等都决定了她只能站在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观察、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更不会深刻。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烧杀掠夺，侮辱妇女，无恶不作，激起我国人民极大愤怒，终于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从北京到山东，杀洋人，毁教堂之烈焰由北到南，熊

镇江市地方志 dfz.zhenjiang.gov.cn

老少皆喜　南北适宜

漫话金陵菜肴

俞允尧

京苏大菜在何方

饮食是一件文明，烹调是一种艺术。中国菜肴不仅历史悠久，且向来享有盛誉，历来冠于世界各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曾高度评价了我国的烹饪技术，他说："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也。中国烹调技术之妙，亦足以表明进化之深也。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创造了数万种精美菜肴，各地匀有其独特风味，形成了多种菜系，驰名世界。素有"京苏大菜"之称的南京菜肴，在我国的菜系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记得清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28回中曾写道："当下三人会了菜钱，一同出来，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堂倌上来问菜，季恬点了一卖肘子，一卖板鸭，一卖醉白鱼。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留着肘。再做三分银子汤，带饭上来。"通过这段具体细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秦淮胜地丰富多彩的南京菜肴。在该书中提到的，还有芦蒿炒豆腐干、茭儿菜鲜笋汤、盐水虾、板鸭、蟹羹、牛首豆腐干、猪油饺饵、鸭肉烧卖等南京时令菜肴名点。足窥南京菜肴历史久也！

南京菜肴又以"京苏大菜"闻名遐迩。何谓"京苏大菜"？烹饪界曾热烈议论过，一说为"北京菜加江苏菜"，一说为"南京菜加苏州菜"；但烹饪大师胡长龄认为："京苏大菜就是南京菜"。此话不假，南京是我国文化古都之一，历史上曾多次为我国

熊燃烧，时年九岁的赛珍珠，由中国保姆护送进英国驻镇江领事馆（今镇江市博物馆），俟反抗风潮日渐平息，才回崇实女校继续学习（当时在校内平房向我古文教员学经）。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对义和团运动始终是抱敌视态度的。她早期虽曾著文批评美国教会人士在国外的某些做法，但是，她是从维护美国在华的殖民利益出发的；她晚年的政论主要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并攻击共产主义。这是由其历史和阶级的根源所决定的。

赛珍珠对中美交流有过一定的贡献，她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年）。她一生所得稿费达七百多万美元。1967年，她捐赠大部分存款，成立"赛珍珠基金会"周济扶植饱受屈辱痛苦与贫穷折磨的两万八千名混血儿童（父为美国人，母为亚州人），奖掖文学创作有卓著贡献的青年作家。

1973年，赛珍珠病故于美国。弥留之际，欲吃崇实女校附近黑桥底下所售烧饼，并嘱安葬其骨灰入崇实教会学校校园，以表对在镇江度过的十五年孩提至少年时代，以及崇实女校三年多教书生涯一往深情的怀念。

南京市地方志 dtz.nanjing.gov.cn

政治、经济的中心，可谓“京苏”；南京菜中名菜甚多，花色菜尤繁，历史悠久，渊源很深，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曾大量记有吴楚肴馔，如牛筋、叉烧羊羔、清炖甲鱼、焖乌龟、煮天鹅、烩水鸭、卤鸡等，调味有酸酱、甜酱。生动反映了当时吴楚菜肴之特色。东吴建都建邺后菜肴进一步发展。记得后晋人左思的《吴都赋》中曾云，金陵富人“珠服玉馔”，可见当时饮宴已十分讲究。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各族人民大迁移大混合时期，各族的文化、艺术、风习、好尚溶于一炉，饮食烹调艺术此时亦得到丰富发展，如从西域、新疆传进的烤肉涮肉，南方闽粤带来的烤鹅、鱼生，西南湘蜀传进红油鱼香，东南江浙的叉烧、腊味，南方的米粽、蒸饺，北方的胡饼、锅盔等，从东晋到南朝，在南京已荟集出现，并互相融汇，形成南京菜的雏形。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南京菜已日俱规模，当年在城内外交通要道开设的几座大型旅馆酒楼，亦可旁证南京菜系的丰富繁多。南京菜是江苏菜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地餐馆主要经营的风味。当年秦淮许多餐馆酒家挂着“京苏大菜”的醒目市招，以此号召顾客。

南京菜素以选料严谨、制作精细、突出主料、玲珑细巧、色泽艳丽而著称，并按时令四季有别，特别善于精制筵席大菜。南京菜在制作上讲究刀功明细而注重火候；在烹调上采用拌、炝、酱、冻、卤、糟、醉、薰、烹、炒、熘、炸、爆、煎、贴、烤、炖、焖、烧、烩、煨、煮、蒸、涮、汆、扒、佳霜、蜜汁、拔丝、以及综合烹调等30多种方法，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其中尤以擅长炖、焖、叉烤的烹调技术。南京菜特别注重滋味，有“七滋七味”之说：酸、甜、苦、辣、咸、香、臭（如臭面筋、臭干，臭而香鲜）；鲜、烂、酥、嫩、脆、浓、肥。有的菜以鲜、香、酥、脆为主，有的菜以咸为主，咸甜适宜，甜而吊鲜，酸而去腥、解腻，苦而清香，辣而不烈，脆而不生，浓而香醇，肥而不腻，淡而不薄，其形硬而质软，酥烂脱骨不失其形，滑嫩香脆不失其味，特色各俱。记得有位名教授曾撰文说：“南京菜不象北方菜偏咸，又不象南方菜偏生，不象川菜那么辣，更不象苏扬菜那样甜，南京菜可谓老少皆喜，南北适宜。”这段文字颇有见地地道出了京苏大菜之特色及适应面之广。南京菜在形式上还可分可合，分者三五人就餐，一盘可上；合者装盘造型，高档酒席中可作为大菜。

南京菜的种类多，名气大，每种烹调法又有明细分类，仅叉烤菜就有烤方、烤鸡、烤鱼、烤鸭、烤猪等。而久负盛名的鸭馔，素有甲天下之誉。鸭馔在南朝时就有了记载。以至后来形成了鸭全席。如今的鸭类菜异常丰富，品种有盐水鸭、金陵叉烤鸭、料烧鸭、黄焖鸭、清炖鸭、珍珠鸭、月宫鸭、葫芦鸭、面包鸭、文武鸭、卤鸭、酱鸭、松子鸭卷、熏仔鸭、香酥鸭、茄汁鸭块、砂锅鸭块、烩鸭舌掌、美味肝……从整到碎，洋洋大观，令人食指大动。其中烤鸭尤为佳品，誉满中外。记得三十年代，北京的“便宜坊”就挂了“金陵烤鸭”的招牌。一种鸭子做出如此丰富的菜肴，其技术之精，技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香嫩美的艺术冷盘

南京菜在形色上最令人大饱眼福的是冷盘菜，它在南京菜肴中占有重要位置。

南京菜肴的冷盘很讲究香、嫩、美。冷盘的香与热菜的香有所不同，冷盘香一是由原料本身加热时产生的香，二是由各种调料以文火收干卤汁“凝结”的香，还有的是用红糖、茶叶烟雾熏出来的香。所以冷菜肴既能香味扑鼻，又可满口香醇，有的越尝越香，余味不尽。著名的冷盘菜如马祥兴的“五香熏鱼”、“干切牛肉”，绿柳居的“老卤面筋”，江苏酒家的“拆烧”，六华春的“手撕鱼”等。嫩是南京冷盘菜肴一个重要特点。

漫话腊八粥

彭春生

“家家腊八煮双弓，榛子桃仁染色红。我喜娇儿逢览揆，长叨佛佑荫无穷”。诗里“双弓”就是“粥”的代称，“览揆”就是节日的意思。清代常熟诗人孙雄的这首《岁时杂咏》绝句，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苏南人民煮腊八粥和家长与儿童在这天唠叨着求神保佑的情景。

农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最普遍的风俗了。在民俗学家的心目中，农历十二月吃“腊八粥”和中秋吃月饼，端午吃粽子，重阳吃糕等习俗是同样重要的风俗习惯。

据说这个风俗的兴起这与朱元璋有关呢。相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小的时候，帮地主放牛糊口，那时，放牛的没早饭吃，他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一天，他饿得实在吃不消了，就到主人家偷东西吃，结果被主人发觉了，就把他关在一间柴房里。由于饥寒交迫，他想在柴房里找点东西充饥取暖。然而，东摸西找，什么也没有得到。在绝望中，他突然发现一个老鼠洞，他想：捉只老鼠填一下肚子也好。他挖到一个老鼠“粮仓”，这个粮仓里有些杂七杂八的粮食，他集中起来煮了一小碗粥。因为他早已饥肠辘辘，加上这粥里有豆子、珍珠米、芋头、红枣等等，因此吃起来觉得非常可口。

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做了皇帝，他吃山珍海味觉得乏味，就想换一换口味。吃什么呢？他猛然想起放牛时被关在柴房里吃的那顿美餐。他就把做饭的要求下达给御厨，要他们按旨意去办。因那天正好是农历十二月初八，他手下的人就把这顿稀饭称为“腊八粥”。《燕都游览志》记载，明朝一代都有十二月八日赐百官腊八粥的习惯。看来是沿袭明太祖的祖风。从此以后，官员模仿皇帝，民间模仿宫廷，这样，每年在这天煮腊八粥就从南京传遍全国，形成了一个风俗。

其实，吃腊八粥的风俗在明代以前早已有了。就“腊八”本身而言，原是周代的祭祀名，因为这个祭祀是在农历十二月举行的，农历十二月又称“腊月”，把祭祀的这一天称为“腊日”据《荆楚岁时记》讲，南朝时，这天除了祭祀外，还有“村人击细腰鼓，作金刚力士以逐疫”的风俗。周代的“腊日”没有固定的一天，汉代以后才改为农历十二月初八为“腊日”，俗称“腊八”。为什么要改在十二月初八呢？因这一天相传是佛教开山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为了纪

形硬而质嫩，这不仅要选料恰当，而且加工时须掌握火候，不过不欠。如盐水鸭、油鸡、白肚、卤肫等冷菜，嫩软不腻，鲜香味醇。

南京冷盘的美，不仅在于厨师的刀功和装拼时的艺术设计，还在于厨师的雕艺。食品雕刻是现代烹饪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之一。它是用脆而不软、皮中无筋、肉实不空，色泽光丽、形态端正的瓜果等作原料，用来设计造型、装饰菜肴、美化筵席，以增进人的食欲。曾有一位画家看了食品雕刻后，欣然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厨师，联曰：“烹调好手，艺术同行。”这说明厨师的食雕和拼盘造型，与美术、塑雕或木刻是息息相关的。凡是画家上得画的花卉鸟兽，都能通过厨师的妙手反映在食品上，如各种花朵、吉祥之鸟，以及民间流传的“松鹤延年”、“龙凤呈祥”、“孔雀开屏”等，都能雕刻拼盘。南京冷盘在历代厨师们的精心设计和创制下，产生了一批批美观大方、色彩调和、格调高雅、艳而不俗的佳肴，而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念这个日子，佛教徒在每年农历十二年初八以米和果品煮粥供佛，称为“腊八粥”。这在《百丈清规》中有这样记载：“腊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成道之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并把这天称为“腊八节”或“成道节”。到宋代，吃“腊八粥”的风俗在全国各地都相当普遍了。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第十卷中记载：北宋京城开封，每到十二月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南宋词人周密在《武林旧事》第三卷的《岁晚节物》条中说，“腊月初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从这段文字里反映了南宋杭州人民吃“腊八粥”的风俗。那时候，腊八粥除了自己吃以外，还作为相互馈赠的礼品，有的人则挑着它走村串巷地叫卖。正如大诗人陆游诗中所吟诵的“今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这表明吃腊八粥已是当时城乡极普遍的风俗了。

后来，为什么有人会把“腊八粥”说成是明代朱元璋兴起的呢？除了后人附会之说而外，追究其原因，不外乎朱元璋当过和尚加之他又是明朝的当权人物，腊八粥经他一吃，于是就更加盛行起来。到了清朝，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制作腊八粥的原料则更讲究：“腊八粥者，用薏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稻、松子及白糖、红糖、葡萄，以作点染。”这时的“腊八粥”，已不再是单纯的供佛粥，而成为人们享用的美餐了。

南京的腊八粥和外地的大致差不多，不外乎用糯米、红豆、红枣、栗子、核桃、花生、瓜子仁等煮粥，只是多了一样白果。粥要煮得稀烂，放上白糖，吃起来甜糯芳香，很是可口。

但是旧时普通人家吃腊八粥，非那么香甜，因为每年腊月初八、十八、二十八这几天是传统的还债日子，还不起债务的人家就得四处躲藏。所以这些穷人就没有这份心思来品尝腊八粥了。因而老南京有句俗话：“第一腊八还能过，第二腊八急如火，第三腊八无处躲”。那时南京水西门内的仓巷中有个卧人佛寺，每年一到腊月，寺庙中的方丈就领着全寺中的和尚，穿着袈裟，手捧钵盂沿街化缘煮腊八粥的米粮、果仁等材料。在腊八这天，煮出腊八粥，施给那些没有钱还债的穷人。据说吃了这种粥，可以得到佛的保佑。因此南京人又称腊八粥为“佛粥”。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腊八粥”营养丰富味美可口，老少皆宜，有益无害。若经常吃它，可以防眩晕症，治疗内寒泄泻，起到舒筋活血，壮肾补虚的作用。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的时节，吃一碗热腾腾的香甜腊八粥是大有好处的。

且能体现出物质美与精神美的结合，令人一饱眼福和口福。记得40年代，秦淮著名厨师陈炳钰创造的“蚕吐丝”、“蜂酿蜜”等冷盘，受到各界名流的赞叹和青睐；后来复兴菜馆（现江苏酒家）名厨高长海创制的人物冷盘“渔樵耕读”等亦久负盛名。

近年来，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上，秦淮著名厨师杨继林制作的冷盘“蝶扇”，是以扇扑蝶，以牡丹、月季、梅花等八种花形围衬，造型古雅逼真，色彩艳丽，天趣盎然，令人赞不绝口。1975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南京时，杨继林为宴会创制的大型图案冷盘“百花齐放”，受到金日成和邓小平的赞扬。从70年初，由胡长龄和杨继林共同研创的“孔雀开屏”、“凤凰牡丹”、“梅花宫灯”、“百花争艳”、“松鹤延年”、“花篮”等十多种南京图案冷盘，在全国饮食行业中颇有影响。如今高长海的门人、金陵饭店的副厨师长芮义文所创制的“什锦全盘”等冷碟，深受外宾们的欢迎。（连载之一）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夏　蓓

商联会与商人节



抗战胜利后，工商界为了复苏濒于崩溃的民族工商业，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46年11月1日在南京香铺营公余联欢社开会，宣告成立。这是第一个依法组织的全国性的商联会。①

商联会的成立大会是全国工商界头面人物相聚的一次盛会。大会召开前，各省市代表团纷纷提前来到南京，除江浙及沿海经济和发达的省份派代表到会外，内地、边疆也派了代表团参加，久经沦陷的东三省在回到祖国的怀抱后也派代表在会前赶到南京，特别是台湾省在与祖国隔绝几十年后也派代表来到大陆参加商联会成立大会，此外伦敦、爪哇、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侨不远万里赶来聚会。各地代表还携来当地土特产。如青海代表带来了黑色逢松、细如人发的名菜——发菜，西康代表带来了麝香，甘肃代表带来了贵重毛皮。商极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月笙、副董事长潘公展、社长骆清华、副社长严谔声联名致电商联会，声明《商报》愿为宣达工商行情，沟通工商为意旨，由此《商报》被定为商联会的特约报纸。

开幕时，有四百多人与会。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王云五、马超俊、陈树人等列会致词。蒋介石为商联会成立颁训词：望工商界实现国父在实业计划中遗愿，能成为国际商业竞争中之安全力量，对稳定物价，扶植国货工业，调剂进出贸易等方面做出贡献。王云五也向大会阐明了商联会的成立宗旨。这一天，南京各大报均发了特刊。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商联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理监事三十一人。素有海上闻人之称的原上海商会主席王晓籁当选为全国商联会理事长，王绎斋（南京商会理事长）等五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大会闭幕那天，蒋介石还亲临会场致词，会议结束后，宋美龄邀全体代表在励志社观看了歌剧《孟姜女》。

大会还通过了由贵州提出的以每年十一月一日为中国商人节的议案。此议案一经提出，即得到海内外五十几个会员单位代表的一致赞同，亦依法通过。这是我国首次设的商人节。商人节的设立，被当时商界称之为一件大事，各界人士纷纷题词撰文祝贺。如吴国桢的题词："曰货殖传，曰平准书，棣通万物，坌集五都，任重道远，为疾用舒，利尽山海，绩著寰区。"四川等省各界为庆祝商人节，纷纷举行庆祝活动，张灯结彩，推销国货，减价出售，以示欢庆。

商人节的设立，其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商人间的联系，提高商人的地位，明确商人的责任。

商联会的成立和商人节的设立，在当时对战后经济复苏及提高商人地位等方面都起了一些作用。

注：

自北洋军阀时期以后，先后有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曾设立地区性商联会。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明陵神道上何以置獬豸

刘　凡

明孝陵前神道两旁伫立的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等六种栩栩如生的石兽，不但给皇陵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且各有其掌故和寓意。如狮子乃兽中之王，显示威严；骆驼和象生于沙漠与热带，表示统治疆域之广；麒麟为仁兽，是"四灵"（麟、凤、龟、龙）之首，象征"仁义之君"和"吉祥"；马是皇帝征战的坐骑，表明武功昌盛，江山稳固。当然这些都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无需再作赘述。唯有那个羊头、牛尾、顶生独角，生得似鹿而又非鹿，颇



有些奇形怪状的獬豸（读xiè zhì，懈治），人们对它还比较陌生，它的掌故和传说知之者亦不甚多。近年来虽有报刊加以介绍但说法不一，有说"能辨忠奸"，有说"可明功罪"，又有说"可以辟邪"，然而均未说明出处，孰是孰非，令人莫衷一是。笔者翻检古籍，得其说于故册，摭拾成文，以飨读者。

"獬豸"，最早见于文献是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著的《上林赋》中有"弄獬豸"（一作"弄解廌"）篇。（见《昭明文选》）它是舜时掌管刑法的官员皋陶所豢养的一只独角神羊，如遇二人争斗，它能明辨是非，用角去触那些无理或者有罪之人。因而皋陶审理案件时就依靠它去辨别谁有理谁有罪，然后作出判决，（见《论衡·是应》）。后世把它奉为专门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并且传说它不轻易降世，只有"人君刑罚得中（笔者注："不偏之谓中"），则生于朝廷……"（《汉书·司马相如传》）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曾经得到过，并把它的形象置于法官戴的帽子上，称为"獬豸冠"（见《后汉书·舆服志》）。它的名称和形状在古籍记载中却不尽相同，《说文解字》曰："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汉书》注引张揖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主触不直者。"《论衡》中则说："鮭鱶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他如《史记》、《太玄经》、《述异记》等书对獬豸的记述，除名称略异外，形状和性格大体上都不外乎以上这三种说法。对于名称，徐灏在《说文注笺》中认为，《史记》作解豸，《太玄经》作解蚧，《论衡》作鮭鱶，皆一物而字异，其正字当依《说文》作"解廌"。对于形状他说："或云似鹿，或云神羊，或云山牛者，盖此兽本罕见，各疑其形似耳。"由于它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异兽，人们便按照书中的描绘加上自己的想象，创造性地塑造成现在这种非羊非牛又非鹿的奇形怪状的兽。读者不妨去明孝陵前细细观赏一下这六百年前创造的石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浅谈貔貅

董宁宁

座落在南京东郊风景区的国民革命军北伐阵亡烈士墓之前，有一座高大的门楼牌坊，牌坊前有一对似狐非狐，似虎非虎的异兽，虎视眈眈地守护着陵墓，这异兽就是古籍中所说的猛兽——貔貅。

貔貅是古人崇拜的一种异兽，古时俗称其为白狐。《毛诗》"草木虫鱼疏"中说："貔似虎或曰似熊，白一名执夷，一名白狐。"《说文》曰："貔，豹属，出貉（音陌）国，猛兽也。"我国古代称东北方的民族叫貉，所谓貉国乃是泛称。可见貔貅主要是生活在我国东北深山老林之中，它"搏于山林，伏于岩穴，夜行昼居，求食江湖之上"，（《庄子》语）以凶猛、善搏而闻名。古代行军时，每当前面出现猛兽，排头兵总是高举画着貔貅的旗帜，以此告诫兵士：前有猛兽，切须当心。《礼记·曲礼上》中说："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指的就是上述情况。

在原始社会里，人与大自然的搏斗是极其艰巨的，貔貅这种凶猛善搏的素质，深受古人的崇拜。传说古时有两个氏族，就是以貔貅作为图腾的。（图腾：指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一般用做本氏族的标志）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黑、貔、貅、貙（音处chū）、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引文中的六兽，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由此可见，貔、貅是两种异兽。或许是由于貔、貅外形比较相似；或许是由于貔的名声较大，因之，秦汉以后，貔、貅二兽就合二为一，混为一谈了。到了晋时，貔貅又被引申、比喻为勇猛善战的勇士。《晋书·熊远传》中就有："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的记载。从这以后，貔貅就与勇士联系在一起了。

1929年，孙中山灵柩安葬南京紫金山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在中山陵区建国民革命军北伐阵亡烈士之墓及门楼牌坊，一切建造就绪后，国民党政府又特地从旁处运来貔貅，镇守陵墓。这貔貅一方面象征着北伐将士都是英勇善战的勇士，另一方面又为阵亡烈士之墓增添了赫赫威严。

刻，就可领略出古代劳动人民在赋予它的形象时所独具的智慧和匠心了。

獬豸本是传说中能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古代已成为法的象征。汉字中法律的"法"字古写为"灋"，已把"廌"作为一个该字形旁，喻其本义就是明证。此外，汉代的法官要戴"獬豸冠"；明清时代的执法官员如都御史、副都御史、按察使、提法使、道员等的补服（朝服的前胸和后背用金线和彩丝绣缎的方形图案，称为补服。清代规定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一至九品各不相同，而执法官一样），不分品级一律绣獬豸。至于明代皇陵前的神道旁为什么要立"獬豸"（北京明十三陵前亦如此）。依愚下之见，恐非是为了辨忠奸，明功罪或者辟邪（倘若如此岂不贬低了封建帝王自身的作用），而是因为这种神兽，只有在皇帝法治严明时才出现于世，用以标榜这代帝王是一位执法如山的"圣明天子"，含有颂扬之意。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回顾与展望

——敬告读者与作者

《南京史志》在各级领导和广大作者、读者的关心支持下，1987年经过报刊整顿，政治方向进一步明确，杂志质量稳步提高，在突出地方特色、办出自己风格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1.明确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是报刊的首要问题。去年上半年，我们组织采编人员学习有关整顿报刊的文件，对中央关于“整顿……报刊的重点是解决根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的指示有了进一步认识。虽本刊不是政治性杂志，而是专业性杂志，但也有个用什么指导思想、办成什么内容的刊物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而不是远离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工具。我们要求所有采编人员，时时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要使编出的稿件符合大的政治原则，即使是学术性、资料性较强的文章，也尽可能使昔日的历史资料，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教材。去年来，先后编发的“古城新曲”、“南京文化”、“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五十周年专栏”等数十篇文章，既有史料、又有学术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但在国内引起反响，而且受到了国外读者的注目。日本、美国、法国读者来信称道，如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一位教授来信说：“《南京史志》内容丰富多彩，有历史资料，有民俗知识，有地方特色，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

2.进一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是杂志生存的基础。这一年为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经多次会议研究并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和老作者献计献策。大家说，《南京史志》一定要立足南京这座有悠久文明历史又是社会主义的新型中心城市，要发表有一定学术水平、新鲜的历史资料和大家喜爱又鲜为人知的知识性内容的文章，要办得有广度深度，内容丰富，有地方特色。这在有关栏目中已有所体现，如“钟山风雨”反映历代重大事件；“人物春秋”摹写重要名人；“白下艺文”介绍丰富灿烂的南京文化；“秦淮杂忆”请众多名家畅述古今；“古城新曲”宣传南京取得的新的成就；“风情民俗”展现金陵古往今来独特的习俗，等等，受到了国内许多读者的欢迎和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起到了征集史料、普及知识、提供借鉴、宣传教材的作用，受到方志界负责同志和专家的肯定，“《南京史志》有特色，办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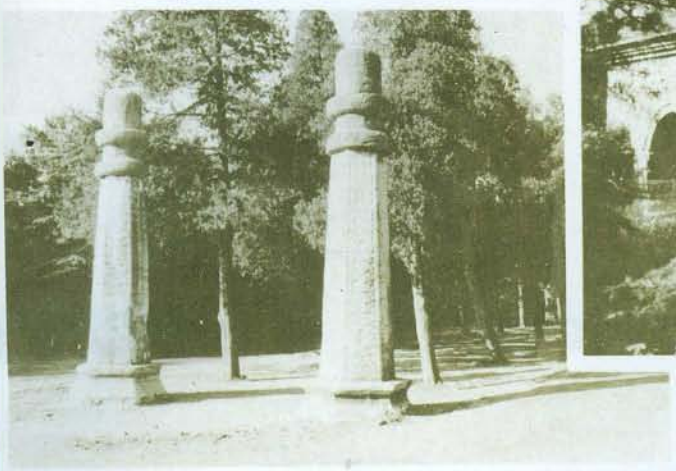
3.广开门路，提高效益是刊物发展的前提。去年来，我们进一步铺开发行网点，打通新的渠道，在全国22个大中城市设立代销点，自办了2个读者服务部，由于采取了多种形式、多条渠道的发行办法，不仅使当年发行量增长20%，而且将往年少量零星期刊也已销光；经济效益也随之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各方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深表谢意！

今年，是《南京史志》创刊五周年，我们力求在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学术水平要更高一些；资料要广博准确；内容要丰富多彩；文字要通俗流爽；风格要典雅清新。殷切希望广大读者、作者继续给予积极的支持，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

《南京史志》编辑部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dfz.nanjing.gov.cn

明孝陵神道华表（又称望柱），为汉白玉凿成上雕云龙。





大金门为进孝陵的第一道正面大门，位于“四方城”即“神功圣德碑”南，原为黄琉璃瓦重楼式建筑，两侧有矮墙相连，今存三拱门为石础砖砌而成。



禁约碑，位于下马牌坊附近，明末起义烽烟四起，崇祯皇帝下令为保护「龙脉」而赶建。



孝陵宝城内有拱形斜坡隧道穿过宝城，上达明楼和朱元璋的葬地「独龙阜」。



今存享殿为清光绪年间重建，从享殿周围遗存的殿基石柱础来看（见下图），当年享殿规制崇宏。左图为殿基周围排水的螭首。

孝陵宝城，上部明楼木建筑部分已毁，仅存砖砌四壁，仍可见当年的雄伟规模。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